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中国民主运动的思想与实践

Ideas and Practice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第29期
2026年11月
November 2026



本期专题 Cover Story

莫使青史终成灰

——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下篇）

Let History Not Turn to Ashes

— Zhu Yufu's Memoirs of the Democracy Movement (Part II)

中国社保危机：借贷缴社保的荒谬现实

China's Social Security Crisis: The Absurd Reality of Paying Contributions with Loans

失业的人还没找到工作，找钱的人已经找上门了

Before the Unemployed Find Jobs, Debt Collectors Are Already at the Door

渡江 —— 徐光诗作

Crossing the River — A Poem by Xu Guang

中国民运舍生取义第一人　王炳章

中国民主党主办

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王炳章民主勇士奖

颁奖公告

以自由之名 · 致敬民主勇士 · 传承抗争精神

为弘扬王炳章先生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奋斗精神，铭记中国民主事业先行者的奉献与牺牲，《在野党》杂志社特设立“王炳章民主勇士奖”。

一、设立宗旨

表彰不畏强权、坚守理念、勇于抗争的民主人士，传承民主精神，凝聚自由力量，推动中国民主宪政事业的发展

二、表彰对象

为中国民主、自由、法治与人权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尤其关注遭受政治迫害、身陷囹圄的民主勇士

三、提名与评选

候选人由追求民主自由、关切家国与中国民主运动的各界仁人志士提名，经《在野党》杂志社、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共同讨论确定

四、颁奖时间

本年度奖项将于2026年国际人权日期间正式颁发，并向社会公布获奖名单

民主之路虽漫漫，自由之火永不熄灭。

愿以此奖致敬不屈的民主勇士，让坚守者不再孤独，
让牺牲者不被遗忘，让抗争精神代代相传。

主办单位： 《在野党》杂志社、中国民主党联合总部

协办单位： 洛杉矶反送中纪念馆、中国民主人权联盟、自由雕塑公园、中国民主阵线、美国民阵、中国自由军、中华共和党、中国民主党（USA）

颁奖日期：
2026年12月6日

颁奖地点：
反送中纪念馆
300 S Garfield Ave #111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目 录 *Contents*

总第29期
2026年11月

人物专访

从追求财富自由到探索精神自由 04
莫使青史终成灰 08

民主火种

中国年轻人从读成功学到读毛选 12

时事评论

华为——中共权力逻辑的缩影 14
贷款交社保？看中国社保现状危机 16
五中全会33名高官被开除党籍，反腐十多年究竟反出了什么？ 18
灵魂拷问：中共跨国镇压何时休？ 21
国安法之刀：先香港，后澳门 22
虚妄的宏大叙事与极权危机——从历史基因看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破产 24

社会评论

我们为什么反共？ 26
失业的人还没找到工作，找钱的人已经找上门了， 28
一支烟头，一口黑锅 29
姆巴佩伤害的是共产党的感情，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31
习近平担忧的互联网执政关，可能正是变革的突破口 33
那堵墙，与这堵墙 35

民运之声

盼着习近平退位，不如盼着共产党倒台 36
在罗德岛悼念一位法官，回望故土的司法之痛 38
写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夜 40
王怡牧师是否真的颠覆国家政权 41
高楼之下：繁华与文明的距离 42
渡江 ——献给阿亮以及所有点燃生命的人！ 46
下沉时代，我们没有资格苛责沉默者 47

作品连载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49
《政治民主》第六章2-3节 51
第七章 民主政治的运作 53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连载） 57

迫害实录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43期 60

杂志社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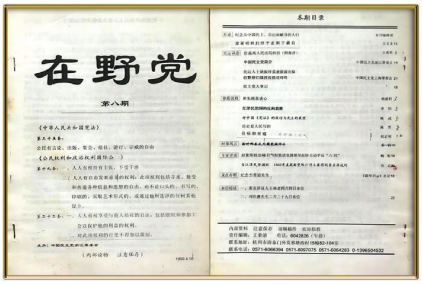
《在野党》简介 03
杂志社组织架构与读者信 62
幕后团队 63

《在野党》简介

Introduction to The Opposition Party

《在野党》杂志是中国民主党组党时期唯一的党刊，以传播中国的民主、人权等理念为宗旨，成立于1998年9月。《在野党》由毛庆祥先生倡议，并在中国浙江省创办，浙江筹委会成员轮值各期的编辑。出刊至第9期后，绝大多数成员被抓，刊物由聂敏之、陈树庆、王荣清继续出刊至第11期，因聂敏之等人被抓而停刊。

但民主火种一直未灭，在历经27年之久，在毛庆祥、谢长发、朱虞夫和郑存柱等海内外中国民主党人的共同努力下，期刊于2025年6月25日在美国洛杉矶成功复刊。它正在以全新的面貌，延续前辈的精神火炬。


在野党
第八期

图为《在野党》第八期

创刊 / Founded	复刊 / Revived
1998.09	2025.06

复刊《在野党》杂志分为《思想火种》、《真相中国》、《民运之路》、《视频专栏》、《作品连载》、《档案馆》等内容模块，设有官方网站 https://www.zyd1998.com，并于每月25日刊出电子期刊，纸质期刊会同步发布，敬请订阅。

主要成员介绍 *Key figures*

01 毛庆祥 （1950年5月24日）

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新《在野党》杂志的发起者。浙江杭州人，自由撰稿人、人权活动家。1976年“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关押三个月；1978年起投身杭州民主墙运动，担任《四五》、《华东》等民刊编辑，1981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刑三年。1998年积极筹建中国民主党，主编党刊《在野党》。1999年6月被捕，11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八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直至2007年9月14日期满获释。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02 朱虞夫 （1954年2月1日）

现任《在野党》杂志总编辑。浙江杭州人，诗人、异议作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创始党员。1978年底投入杭州民主墙运动，是发起人之一，主编《四五》月刊，并多次被传唤、抄家。1989年“六四”因“参与动乱”被收容审查、撤职；1998年积极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筹备工作，并于当年11月当选为浙江筹委会常务工作组秘书长、全国筹委会筹委。1999年6月19日被捕，9月15日正式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2006年9月15日出狱。出狱后仍持续民主运动，2007年再次被捕判刑二年、剥权二年；2011年因“茉莉花运动”被捕。判刑七年、剥权三年，累计服刑达16年。出狱后仍被严密监控，直至胃癌晚期出境治疗，目前居住在美国。

03 谢长发 （1951年10月7日）

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主席，是复刊《在野党》杂志的倡议人。湖南望城县坪塘镇人，民主异议人士。1989年参与天安门民主运动，在“工自联”领袖，六四后坚持公开谴责当局暴行，被判劳动教养两年。1998年与潘明栋等筹建中国民主党湖南筹委会，屡次遭拘留；自2002年起坚持定期聚会，联系各地民运人士并资助经济困难者。2005年撰写《中国民主党宣言》、《昭告海外同胞书》等文，并筹划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008年因批评汶川地震“豆腐渣工程”再度被捕，2009年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13年。目前居住在中国大陆。

04 郑存柱 （1967年）

现任《在野党》杂志社社长。安徽合肥人，曾任中学、大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企业家、人权活动家、中国民主党党员、海外党部高层人士。1989年六四期间发起合肥学生活动，组织发起安徽省高校自治联合会并率学生赴京声援，是安徽省与政府谈判的学生代表之一。2000年在上海秘密参加中国民主党，2006年在美国洛杉矶创建海外联合总部，历任全国联合总部副秘书长及副主席、主席等职务。

从追求财富自由到探索精神自由

——专访“新希望基金会”发起人，《在野党》杂志公关事务部部长李享

采访记者：贾嘉 | 翻译：戈冰 | 编辑：李晶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一个人的人生，有时会因为一次疾病、一次意外，甚至一次看似普通的冲突，而发生彻底的转向。



李享的人生转折，发生在疫情期间。出生于湖北孝感、创业于深圳的他，曾经是一名典型的中国创业者。努力工作、经营企业、追求事业成功，也积极参与慈善活动。

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不断教育他，要做一个善良、有良知的人。但2022年前后，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和疫情管控，让他第一次如此强烈地感受到：当一个人的生命、尊严和基本选择受到制度性限制时，个人究竟还有多少可以自主决定的空间?

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的重要分水岭。

后来，他来到美国，开始参与海外民运活动。与此同时，他也开始重新思考自由、民主、信仰、家庭以及下一代成长环境等问题。

如今，李享希望用自己创业积累的财富和资源，成立并推动“新希望基金会”。将公益、慈善与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援助结合起来，为长期遭受迫害的民运人士、政治犯及其家属提供支持。也希望通过媒体、纪录片等方式，让更多人了解这些人的经历。

在他看来，资金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告诉那些长期坚持的人：你们没有被忘记；你们的付出仍然有人看见；你们所坚持的精神仍然有人愿意延续。

一、从湖北孝感到深圳：一个普通创业者的人生

李享出生于湖北孝感。谈起自己的家乡，他首先想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董永与七仙女”传说。后来，他将户籍迁往武汉，但他 人生真正重要的创业阶段，则是在深圳度过的。

“我一直是创业，自己做生意、开公司。”在深圳创业期间，他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事业，也取得了不错的经济成果。与此同时，父母从小对他的教育，也一直影响着他。

“我父母从小教育我，要做一个有良知、善良的人。”这种教育让他从年轻时开始，就习惯参与各种慈善活动。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社会上的重大灾难，只要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都会尽可能参与。有一次，他看到灾区的相关报道，甚至亲自和朋友开车运送物资。

“当时看那个视频，哭得一塌糊涂。”

这种强烈的同情心，也成为后来他创办公益基金的重要心理基础。

在过去的人生中，他认为自己一直是一个“遵守规则的人”。创业、赚钱、照顾家庭、参加慈善活动——这就是他过去理解的人生。

直到那场疫情。

二、疫情与疾病：人生第一次真正面对“生死”

2022年前后，李享因为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检查过程中，医生发现肺部出现结节，并建议进一步进行CT检查。“医生当时怀疑可能是恶性的。”之后的检查发现，情况需要进一步处理。按照医生建议，他准备住院进一步检查和治疗。但当时正处于疫情管控时期。在严格的疫情管理环境下，即使手里拿着医院的相关手续，他仍然面临着无法正常前往医院的问题。

“我当时已经感觉身体有疼痛，也比较紧张。我跟太太说，可能真的要赶紧去医院。”在试图离开居住区域的过程中，他与现场工作人员发生争执，随后警方介入。按照他的回忆，他被带走并被拘留。这段经历对他的冲击非常大。

过去，他一直认为，只要自己遵守规则、努力工作、不触碰法律，就能够过好自己的生活。但这一次，他突然意识到：个人的命运，有时候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

更大的转折还在后面。

2023年，他接受了手术。经历疾病、手术以及疫情期间的种种遭遇后，他开始重新审视过去的人生。

“那时候我真正开始觉醒了。”李享说到。

三、从“被教育的人”到“独立思考的人”

李享说，过去的自己，是在中国传统教育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小接受的教育告诉他，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听父母的话、遵守规则。他也确实按照这样的轨迹成长。但当生命真正受到威胁，当个人自由受到限制时，他开始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思考：

我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以前就是比较听话。但是涉及到生死的时候，你还是觉得自己的想法被彻底颠覆了。”疾病和疫情，让他第一次停下来思考人生。

过去忙于创业、工作、应酬，很少有机会认真思考自由、家庭、信仰以及孩子未来成长的环境。而那段人生低谷，反而给了他这样的机会。

在这一过程中，他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也逐渐形成了对民主、自由和个人权利的理解。后来，他决定离开中国。

2024年10月左右，他来到美国。来到美国后，他很快开始参与海外民运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接触、认识长期从事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其中，对他影响最深的人之一，就是朱虞夫。

四、朱虞夫：一个长期主义者给他的启发

李享是做投资的人。在他看来，投资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独立思考、保持理性和长期主义。

而在认识朱虞夫之后，他发现，民运道路上同样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长期主义”。朱虞夫长期参与中国民主运动，也曾长期遭受打压和关押。在李享看来，这种坚持本身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精神力量。

“一个人长时间去参与民运，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进去，我觉得这种精神放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可能成功。”

但问题是，民运并不像商业投资。商业投资可能有财富回报，而长期参与民主运动的人，很多时候面对的却是风险、压力、失去自由，甚至长期看不到结果。

“他需要漫长的忍耐、痛苦和心理上的抗衡。”这种精神让李享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开始思考：如果一个人在没有明显物质回报的情况下，仍然愿意坚持几十年，那么这种精神本身是否值得被更多人看见？

他的答案是肯定的。

“我每次跟朱老师交流，都能够从他身上吸取养分。”这种影响，也逐渐促成了“新希望基金会”的构想。



（左三 李享 右三 朱虞夫）

五、为什么叫“新希望基金会”？

李享说，基金会最核心的理念，其实就是两个字：希望。

他希望通过基金会告诉那些长期坚持民主运动、长期遭受迫害的人：你们没有被忘记。尤其是一些长期参与民主运动的人，他们可能已经坚持了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有些人在国内遭受过长期关押和打压，甚至因为参与民主运动失去了正常的社会保障。

“我们更大的作用，是告诉他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在李享看来，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只是最直接的物质帮助。真正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认可。“资金只是我们对他的一个物质帮助。更多的是一种希望。”因此，他最终将基金会的核心理念确定为：重燃希望。

六、基金会将帮助哪些人?

在目前的构想中，新希望基金会主要关注几类群体：

第一类，是长期参与中国民主运动、遭受迫害或者正在被关押的政治人士。

第二类，是这些人士的家属。

第三类，是仍然活跃在海内外民主运动一线、需要支持的民运人士。

第四类，是曾经在中国大陆长期遭受关押、打压，来到美国之后仍然面临生活困难的人。

李享希望未来能够建立比较规范的评选和援助机制。基金会可以通过年度奖项、公益援助等方式，对值得肯定的人给予支持。而这些奖项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给多少钱”。更重要的是：让坚持者知道，他们的努力有人记得。

“我们希望形成一种精神的传递。”

七、从基金会到媒体：让更多人知道他们的故事

除了直接的人道主义援助，李享还有一个重要计划：通过媒体记录这些人的故事。

他认为，很多民运人士的经历没有得到足够记录。一个人可能在国内被关押十几年、二十几年，经历了巨大的个人牺牲，但外界真正了解他的故事的人并不多。

因此，他希望未来与《在野党》杂志进一步合作，通过人物采访、专题报道等方式，把这些故事保存下来。“我想通过纪录片的形式，更深层次地进行传播。”未来，他希望制作具有较高质量和深度的人物纪录片，通过英文内容向美国乃至国际社会传播。

在他的设想中，可以成立一个专业的制作团队，根据实际情况，每月或者每季度推出一部作品。

他希望通过影像，让国际社会看到那些鲜活的个人故事，而不是仅仅看到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

八、为什么要把这些故事讲给美国主流社会?

这是李享对基金会未来提出的另一个目标。他希望通过公益援助、年度奖项、人物纪录片以及媒体传播，把中国民主运动中的人道主义故事带入美国主流社会。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一项政治工作，也是一项公益事业。

“我们做了大量的评选奖项，有很多民运人士，有很多纪录片，也会长期支持受到政治迫害的人。”

“这是一种公益和慈善。”

他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专业人士、公益人士、媒体人和社会人士参与其中，让这些内容通过更加专业的方式进入更广泛的社会。

九、财富自由之后，他真正寻找的是“精神自由”

李享曾经是一名成功的创业者。当他来到美国时，他并不是一个需要靠政治运动改变个人经济状况的人。相反，他已经通过创业获得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自己现在做基金会，并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回报。

“我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快乐。”他认为，人到了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之后，财富已经不再是唯一目标。真正重要的是：自己这一生究竟留下了什么。

“让我自己的内在进行精神上的提升，让我对生活、对自己的人生充满积极的能量。”

这可能是他创办基金会过程中得到的最大回报。从过去追求事业成功，到现在开始追求精神价值，他认为这是自己人生的一次新的转型。

十、给孩子一个不同的成长环境

李享说，另一个推动自己改变的重要原因，是孩子。当一个人开始成为父母，他思考的问题往往不再只是“我想过什么样的人生”，还会变成：我的孩子将在什么样的环境中成长?

他开始意识到，一个人的成长，不仅仅取决于家庭教育，也取决于整个社会环境。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在一个更加自由、开放、鼓励独立思考的环境中成长。

“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在一个能够自由思考的环境当中成长。”这也让他更加坚定自己今天正在做的事情。因为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真正的进步，并不仅仅是经济发

展，更重要的是人的精神是否自由，是否能够独立思考，是否拥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十一、从一个人的努力，到更多人的参与

李享并不认为一个基金会可以靠一个人完成所有事情。他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具有共同理念的人加入。

“我希望更多优秀的人能够跟我们一起参与。”

他认为，很多人愿意做公益、做慈善，并不一定是为了身份或者名利。他们真正想寻找的，是一种人生价值。

“如果能够团结更广泛的优秀的人一起参与，这本身就是一项慈善事业。”

在他的设想中，新希望基金会最终不只是一个提供资金的机构，而应该成为一个连接者：连接需要帮助的人、愿意提供帮助的人、媒体、公益组织以及国际社会。

十二、写给未来：让希望重新燃烧

回顾自己过去的人生，李享经历了创业、财富积累、疾病、疫情、人生低谷，也经历了来到美国之后的重新选择。如果说过去的他追求的是事业上的成功，那么现在的他更加在意：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说，父母从小告诉他的那句话“做一个有良知、善良的人”，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生命。只是年轻的时候，他更多是在按照父母告诉自己的方式生活。而经历过人生的重大转折之后，他开始真正理解这句话的意义。善良，不只是帮助身边的人。良知，也不仅仅意味着遵守规则。它还意味着，当你拥有一定能力的时候，是否愿意为那些暂时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做一些事情。这也成为他今天创办新希望基金会的出发点。

从个人的觉醒，到公益的行动；从一个人的选择，到一群人的坚持。

对于李享而言，这或许就是他所理解的“新希望”。而他真正希望燃烧起来的，也许并不是某一笔资金，而是一种不会轻易熄灭的精神。

正如他所说：“我们希望告诉他们，他们没有被忘记。他们坚持的精神，我们还在延续。”这，或许也是一个人从“财富自由”走向“精神自由”之后，对人生价值最朴素、也最坚定的一种回答。

文中摘句

> **你们没有被忘记；你们的付出仍然有人看见；你们所坚持的精神仍然有人愿意延续。**

莫使青史终成灰

——朱虞夫的民运回忆（下篇）

记者：沈美花 贾嘉 | 编辑：李晶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摘要：朱虞夫亲历文革、杭州民主墙、八九民运及中国民主党筹建，三次入狱、历经十六年牢狱。晚年回忆往事，只为留下民运历史，让后人铭记那些为民主付出代价的人。

人物简介



朱虞夫，浙江杭州人，中国大陆民主运动长期参与者，中国民主党早期重要参与者之一，《在野党》创办人。

十六、徐文立与北京党部之争

对于徐文立后来参与中国民主党的过程，朱虞夫有非常强烈的个人评价。

按照朱虞夫的回忆，浙江筹委会曾在1998年9月派人去北京，希望推动北京也成立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最初接触徐文立时，徐开门见山说：“你们要我搞，可以。但是我的位置怎么放？”他把吴义龙问懵了，吴是来点火的，不是来找个主席回去的。如果北京筹委会搞起来了，徐可以被选为北京主席，不必问吴；如果徐是要成为浙江主席，吴也作不了主。徐看到吴愣在那里不作声，立马就下了逐客令：“我不搞，你走吧。”第二天，徐文立公开宣布“多读书、广交友、缓结社”，谁都能看明白徐对组党的态度。对此徐文立的辩解是“缓结社”就是“要结社”。吴义龙出门后拿出联络名单，找到任畹町的联系电话，就去任畹町家，任畹町一口答应组建中国民主党北京筹委会，并在9月17日正式启动成立了。

自从山东朋友在9月6日谎称中国民主党山东筹委会注册成功的消息，各地的民主党人大受鼓舞，一下子都公开打出旗号来。

徐文立在这场组党高潮中明显被冷落了，他非常不甘，11月6日，他突然提出要筹备中国民主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匪夷所思地与他太太一起发表公告，他们“自即日起永不置办私人固有财产”。理所当然徐文立的做派被大家认为是“摘桃”，他的“代表大会”没人响应。可能徐文立自己也意识到他连民主党都还没有建立，直奔全国主席的步子跨得太大了。于是徐文立在9日建立了“中国民主党京津党部”。他为了“跑在全国朋友的前面”，要从体量上超过大家，居然把毫不知情的吕洪来任命为“副主席”，作为一个官瘾巨大的人，他满以为吕洪来可以用“副主席”摆平、拿捏。从此中国民主党开始了另立山头，并招致了中共的镇压。为此徐文立的说法是组党迟早会被镇压，但是对于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民主党，中共如果迟镇压，中国民主党可以在国内得到更好的发展。

徐文立在北京党部建立后立即封自己做全国主席。当时他给朱虞夫打电话，说：“中国民主党全国党部成立了，我任主席，秦永敏任副主席，因为你们浙江是首先建立民主党的，给你们留一个副主席位置，限你们在二十四小时内报一个名字上来，否则，你们浙江就出局了，以后中国民主党没有你们浙江的份了！长江以北我负责，长江以南秦永敏负责。”正好祝正明在旁边，朱虞夫就把电话交给祝正明接听了。祝正明一声不吭地听，听完挂了电话，对朱虞夫说：“我们不理他。”对此，在许多年后，徐文立自己也感到这个电话实在太不像话了。

朱虞夫一直认为中共在对付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中煞费苦心用尽了一切手段，当年判决三个民主党人用阶梯式的刑期，11年、12年、13年，难道他们的“罪行”相差一年吗？朱虞夫认为中共是在布局，在悄悄安排未来的谈判对象，对于徐文立的德性中共看得很清楚。

出国后的徐文立不断为自己涂脂抹粉，利用海外话语权自吹自擂是“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他在几十年前的“甘家口会议”就提出了组党。但是他不知道，1906年清廷开放党禁，就有了“中国民主党”，1960年，雷震也建立了“中国民主党”。中共建政以后许许多多“组党”的先驱，被中共以“反革命集团首犯”处决了。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中共在镇压中国民主党的过程中，罗织、拼凑“罪状”几近病态，这么“重要”的“甘家口”策划居然不拿出来说事？历史的真实记载是直到1998年10月5日，《彭明、徐文立关于大陆组党结社问题的三点倡议》，白纸黑字写着“三、衷心希望各地朋友…暂缓提出组党的申请”，难道他忘了吗？

多年后朱虞夫与王有才谈起当年徐文立出于个人野心对中国民主党的损害，王有才说，徐文立是个枭雄，弄不好他三拳两脚真的打翻了共产党。朱虞夫认为，可惜这个人擅长表演，就像他在被捕前信誓旦旦说永不出国一样，他出国不是中共抬上飞机的。根据中共的规定，任何减刑、假释、保外就医都必须“认罪服法”，2002年，当局也与狱中的秦永敏谈过，让他“认罪服法”，换取司法部假释出国，被秦永敏断然拒绝了。朱虞夫认为，可惜这个人没有文化，居然把自己的豪言壮语张冠李戴，把鲁迅的“我以我血荐轩辕”说成是谭嗣同的诗句，炒得沸沸扬扬。朱虞夫认为，中共在2002年6月不惜代价将王炳章绑架回国，又在半年后将徐文立放出国外，这二者难道不是精心策划的吗？

朱虞夫尤其痛恨的是，居心叵测的街混子迎合徐文立的私欲，歌颂他是“日出美东”，他头脑一热还扶植起了“中国民主党国际联盟”。

朱虞夫说，这也算是物以类聚吧。

十七、关于资金问题

记得当年浙江看不惯徐文立的狭窄心眼，不买徐文立的帐。徐文立居然揣度浙江像他一样是有海外的金钱在支撑着，他立即给海外写信，要海外给浙江“断粮”逼浙江就范。

他看失了眼，海外“中国人权”除了收买个别人点对点的汇钱外，从来没有任何人为浙江其他民运人士汇过钱，至少在朱虞夫坐牢之前一直如此。

浙江筹委会得到王炳章等海外人士的关注和关心，大家都认为有必要组建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其一是可以通过海外后援会把国内的事件及时向海外通报，其二是由于通讯文稿传达受限，希望海外能够帮助国内购买传真机。海外也确实办到了，为浙江捐助了一台传真机。

王荣清以追索八十年代做生意欠款为名，向傅申奇要了一万元人民币，这笔钱全部用于浙江筹委会的必要支出。我曾想为组织发展向海外某朋友商量捐助，他回复我，海外朋友也都过得很苦，当年民主墙时候大家都是自掏口袋坚持下来的。我从此不再提此事。

浙江筹委会里王荣清最富有，外地朋友来杭州几乎全部由他接待，贫困地区来的朋友他还屡屡赠送回程路费。平时，毛庆祥、朱虞夫和李锡安也经常掏钱办事，如为吴义龙各地“点火”筹集路费和食宿费用（当时我们都不知道姚遵宪私下与吴义龙约好同行并承担了大部分行程费用），姚遵宪回来后，出国前将卖掉上海商品房的二十多万余款交给吴义龙作为浙江筹委会的活动经费。吴义龙向所有人瞒下了，交给了他女朋友，吴出狱后向女朋友索要，女朋友不给。这是后话了。

朱虞夫为组党个人前后筹资约一千多元。

《民主论坛》的洪哲胜知道浙江的困难又爱莫能助，希望浙江朋友能投稿赚点稿费。但是中共知道自己当年组党全靠“卢布”，它们也以为中国民主党是靠海外资助搞起来的，要求警察严查有没有海外资金进入，给警察的赏格是，警察可以反馈拿到没收款项的60%，警察非常兴奋。在这种情况下，朱虞夫对海外朋友说，他的稿费暂时不要汇入国内。如果要汇就汇去他日本妹妹那里。这些稿费里有其他朋友的，朱虞夫出狱后，他妹妹把那些钱如数交付，一共九千多人民币。

朱虞夫他们入狱后，浙江筹委会由聂敏之、陈树庆打理，他们将海外资助受难者家属的捐款分配给各家，朱虞夫家属收到二千元人民币，警察随即上他太太工作的医院如数收缴。以后就没有以后了。甚至连一个慰问电话都没有，以至于他在狱中受尽酷刑。

十八、海外民运

海外民运有国外民主基金会的支持，按理说在中国民主党如此艰难卓绝的境况中应该挺身而出，但是非常遗憾。海外各民运大佬之间互相敌意之深，各人势力范围之严是国内朋友所无法想象的。正可谓内斗内行、外斗外行。国内民主党兴起时，某大佬接受台湾记者采访，被问及国内民主党，他大嘴一咧“他们都是共产党的特务”。所以，后来朱虞夫说剿灭中国民主党，“海外同道”比中共出手更早、更狠。

更令人齿寒的是，当国内二十几个省市都纷纷成立了中国民主党筹委会，势成燎原之际，有人开始伸手“收编”。99年二月，有人去朱虞夫家找他，出示一份“某人给国内民运人士的一封信”，信文主要讲一件事：你们国内组党是接受了我的指示才搞起来的。朱虞夫表示自己没有接受过“指示”，但是不知道是不是别人接受过“指示”，需要把信给其他朋友看一下，让对方过两天来听答复。朱虞夫问了几位朋友都说没有。朱虞夫心里明白了，对方只不过用指鹿为马的方式拉拢投靠者，但是既然自己是人类良知的追求者，不能丢弃诚实的道德品行。他如实回答信使后，对方失望地走了。不几天从南方传来消息，信使每到一地就动员把民主党解散，并慷慨撒钱。所以，王炳章等被“海外民运”排斥、被“边缘化”的少数朋友的支持显得尤其珍贵。

当年海外除了王炳章，还有几位热心朋友，都纷纷提出国内授权他们组建中国民主党海外筹委会，或愿意为国内朋友在海外发声，授权成为海外发言人。朱虞夫大大咧咧地对祝正明（祝是浙江筹委会的召集人，朱虞夫只是秘书长）说，这样很好啊，就同意吧。祝正明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他怕海外乱来（谢万军出来后，海外真的乱来了），就表示拒绝，为了给朱虞夫留点面子，就说发言人期限二个月，把有意想成为浙江筹委会海外发言人的杭州老乡徐某气得拂袖而去。在毛庆祥、王荣清、李锡安

的坚持下，祝正明终于让步，和朱虞夫发了授权函，建议海外建立了中国民主党海外后援会。海外后援会的作用主要是把国内的情况及时向海外播报，并尽可能为国内筹措资金。海外后援会也确实大大地推进了国内组党活动的发展。

现在回看当年，海外当时还没有人擅自随随便便就打个“中国民主党”旗号招摇撞骗。谢万军出来后看到了利用中国民主党做政庇的商机，阿狗阿猫纷纷出动，据说法拉盛出现了“中国民主党”一条街，十几个“中国民主党”争抢生意，与移民律所合作开吃了民主党人的人血馒头，如今在洛杉矶干脆移民律所总经理兼任中国民主党主委了。

十九、《在野党》月刊

在中国民主党的发展过程中，《在野党》的诞生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回望历史，浙江筹委会相对于全国各地的民主党组织，是最认真，最坚韧，最悲壮的团队。浙江筹委会初始的六位成员，每个人都独当一面，大家每天都在殚精竭虑地为发展中国民主党出谋划策，毛庆祥提出，浙江筹委会应该办一份刊物，他的提议受到大家一致叫好，毛庆祥就选了一些文章直接去印刷店印刷了，封面印上隶书体的“在野党”，印好拿回来，我感觉这个刊名有点儿违和，大家凑在一起歪着脑袋想半天，也想不出更好的名称，《在野党》杂志就这样横空出世了。王荣清提议，老毛一个人出杂志吃不消，每个人轮流出一期，也被大家采纳了。每期出刊都由王荣清邮寄给有关部门和各地筹委会，多年后湖南谢长发说，当时他们每个月都期待着浙江的这份《在野党》杂志。

当中国民主党遭到大规模镇压后，政保警察逼问毛庆祥杂志是在哪个文印店复印的，毛庆祥坚持不牵连他人，独自承担了下来，为此多判了一年刑。

一个政治组织必须拥有自己的文字记录和思想阵地。

于是，《在野党》逐渐成为浙江民主党重要的民间刊物。

它记录民主党活动，讨论民主、人权和政治制度，也保存许多参与者的文章和历史资料。

对于朱虞夫而言，《在野党》的意义不仅是宣传。

它更重要的价值是：

留下证据。

很多街头活动过去以后不会留下任何东西；

很多参与者去世以后，他们的故事也可能消失。

但是只要刊物还在，至少后来的人能够知道：

某一年、某一个地方，曾经有人做过这些事情。

所以朱虞夫对复刊的《在野党》杂志寄予厚望，要杂志真实地记录现实，探幽索隐，考证每一次事件每一个人物，把网络上在特殊时期形成的错谬予以更正。《在野党》不玩虚的，不搞噱头，不哗众取宠，踏踏实实稳妥运行。

二十、浙江筹委会的精神

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走过了二十八年，二十八年来，浙江的监狱里，每一天都有中国民主党人在坐牢。

浙江民主党人为民主党而坐牢的人次全国第一。

坐牢的刑期之长全国第一。

浙江民主党人坚持不认罪、不减刑全国第一。

浙江民主党人越挫越勇，永不言败，昂扬的斗志全国第一。

浙江民主党人在服刑期间被折磨致死的全国第一。

但是，海外的政治地痞居然说，浙江没有民主党，因为他们只是“筹备”，没有成立“党部”。好在历史不会被他们改变，晒出中共的判决书，历历在目。

朱虞夫提到，在他第一次坐牢前，政保警察好几次对他好言相劝，并说，只要他退出中国民主党，可以担保他一天牢都不用坐，如果不听的话，已经给他定了十年刑期。但是被他拒绝了。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一条充满血与火的荆棘之路。

浙江筹委会的其他成员面对着威逼利诱也是铮铮铁骨、凛凛正气，前赴后继、不屈不挠，写下了中国民主党组党活动中最光彩的一页。





朱虞夫说，随着国际国内的形势发展，中共的气数将尽。民众反抗专制独裁、争取基本人权的斗争将风起云涌，浙江民主党人的事迹将会激励更多的勇士奋起，写下人类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文中摘句

> **浙江民主党人的事迹将会激励更多的勇士奋起，写下人类发展史上的浓重一笔。**

中国年轻人从读成功学到读毛选

作者：张兴贵 | 翻译：戈冰 | 编辑：Geoffrey | 校对：熊辩 | 美编：冯仍

中国年轻人从读成功学到读毛选。表面看，这只是一次阅读口味的迁移；往深处看，它却可能是一代人认识世界方式的转向。转向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读的方法错了、理解偏了，它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非常严重的。

先说原因。第一，成功学破产之后留下的精神真空。过去十多年，成功学给年轻人许下了一个简单公式：努力加方法，等于成功。当就业变难、房价高企、内卷加剧，这个公式被现实反复证伪。一个人拼尽全力却仍然看不到出路时，他必然要去寻找新的解释：到底是我的错，还是这个世界的错？成功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于是许多人转向了能提供宏大解释的文本。毛选恰好给出了一个完整的解释系统：社会是分阶级的，历史是按矛盾运动的，个人的困境可以在结构里找到位置。对迷茫中的年轻人来说，这种确定性本身就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现实困境的叠加。就业市场的竞争，上升通道的收窄，生活成本的压力，让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积累了强烈的挫败感和不公平感。挫败感需要出口，愤懑需要对象。当一种理论告诉你，世间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某个群体、某种势力的压迫时，它很容易被当成情绪的容器。许多人拿起毛选，读的并不是方法，而是许可——许可自己把全部失败归因于外部，许可自己用最激烈的词汇去命名这个世界。

第三，网络传播的推波助澜。短视频和社交平台擅长传播的，从来不是严谨的分析，而是锋利的句子。毛选中的一些论断被整成金句、做成海报、配上音乐，在算法推荐里层层放大。断章取义之下，复杂的历史文本被简化成了立场标签：你读毛选，你就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你不读，你就是麻木、就是帮凶。阅读一旦变成了站队，它离思考就已经很远了。

第四，教育中历史语境的缺失。毛选产生于革命与战争年代，它的许多概念——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继续革命——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今天的年轻人大多不具备辨析这些语境的知识储备，容易把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论，当成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把革命年代的斗争策略，当成处理今天一切问题的现成答案。语境一丢，经典就成了教条。

第五，宏大叙事带来的归属感。当代年轻人的生活高度原子化：独居、独行、在屏幕里社交。成功学是彻底个人主义的，它许诺成功，却不提供归属。而毛选背后的集体叙事不同：它把个人的苦难放进一个宏大的历史进程，给孤独者以“我们”的感觉，给失败者以“不是你一个人的安慰”。人对意义和归属的渴求本无可厚非，但如果这种归属只能靠共同的敌人来维系，它就会从一开始走上歧路。

以下后果，不是对一切阅读者的指控，而是当这种阅读以断章取义、教条化、情绪化的方式展开时，正在显现的危险。第一重后果，是思维方式的敌我化。阶级分析框架一旦被滥用，就会把一切复杂问题简化为敌我问题：企业家天然是剥削者，管理者天然是压迫者，不同意自己的人天然是立场有问题的人。社会问题本来是利益协调问题、制度设计问题、发展阶段问题，需要的是计算、协商与妥协。可一旦被装进敌我框架，协商就成了投降，妥协就成了背叛，理性讨论的空间被彻底堵死。更危险的是主要矛盾的误判：把次要矛盾当成主要矛盾，把个别现象当成普遍规律，把一时一地的具体纠纷上升为你死我活的路线斗争——根源找错，药方必错，而按错误的药方采取的行动，只会让真实的问题更加严重。

第二重后果，是行为方式的斗争化。我们已经在网络上看到太多这样的场景：同学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一旦意见不合，就有人搬出阶级分析的大棒，给对方扣上帽子，组织起声讨与举报。把斗争哲学带进课堂、职场和家庭，结果不是解决了任何问题，而是让信任崩解、让寒蝉效应蔓延：每个人都怕说错话，每个人都学会先表态、先站队、先自证清白。一个社会如果连正常的争论都要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它的活力与创造力将从何谈起？

第三重后果，是对年轻人自身的反噬。用斗争思维看待世界的人，往往同时放弃了对自身的建设：既然一切都是结构与阶级的错，个人努力便失去了意义——这与成功学的努力万能看似相反，实则同病，都是把命运的解释权交了出去。更严重的是情绪的质变：从焦虑、自怜，滑向愤懑、仇恨；从想改变处境，滑向想清算他人。青春本该用来积累知识、锤炼技能、建立真实的人际联结，若耗费在想象的斗争里，损失的是整整一代人的黄金年华。历史早已反复证明：当一代人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于再来一次彻底的斗争时，等待他们的往往不是解放，而是新的灾难。

还有一重后果，必须借助历史才能看清。二十世纪的人类付出过惨痛的学费：每当一种理论把社会成员划分为天生的敌我两类，并号召用斗争去解决问题时，随之而来的从来不是它所许诺的公正，而是告密、迫害与人人自危；每当破字当头成为时尚，被砸烂的往往首先是学校、医院、工厂这些让普通人安身立命的地方。那些年代留下的创伤，至今仍刻在一代人的记忆里。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亲历过那些岁月，容易把书本上描绘的斗争想象得浪漫而痛快，这正是危险所在：对灾难缺乏切肤之痛的人，最容易轻率地呼唤灾难重来。

第四重后果，是社会层面的撕裂与倒退。一个健康的社会，需要在分歧中寻找共识，在法治的框架内调节利益。如果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用革命话语解释现实、用阶级标签划分人群，那么共识的土壤就会持续流失，极端主张就会获得市场，温和、理性、务实的声音就会被斥为软弱与妥协。我们付出几十年努力才建立起来的法治秩序、契约精神和市场规则，都可能在这种氛围里被一点点侵蚀。把二十世纪的某些弯路再走一遍，是我们这个民族无论如何承受不起的代价。

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既有直面现实困境的勇气，也有拒绝简单答案的定力；既读历史，更懂历史。唯有如此，阅读才能真正成为成长的阶梯，而不是滑向深渊的斜坡。

文中摘句

> **愿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既有直面现实困境的勇气，也有拒绝简单答案的定力；既读历史，更懂历史。**

华为——中共权力逻辑的缩影

作者：张婷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张致君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华为作为中国知名的私营企业，近年来在多起争议事件中的应对方式，不断消耗着公众的信任。纵观华为处理问题的表现，哪一个不是与中共非常相似。

2026年10月17日，一辆问界M9汽车在神木市冲撞了交通灯立柱，车辆随即起火燃烧，导致驾驶员不幸遇难。事故发生后，华为发布官方声明称，起火原因是因为“高速情况下车辆机舱遭受剧烈撞击引发线路短路及油液泄漏”，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大企业，拿车速当挡箭牌，甩锅给车主，真正的安全调查都不去做。但是还是有很多清醒的人，面对这样的情况，网友拿监控做了一道物理题，估算车速明显很低。华为用这简单的一纸声明来掩盖事实，实在是龌龊至极。问界已有多起涉及人员伤亡或汽车起火的公开事故报道，但是华为没有把人权放在第一位，不去找出自己的问题，而且每次事故调查和透明度都不公开。10月23日，网友拍到，此前被华为问界M9撞击的交通信号灯柱外围已被围挡遮挡，马上要拆掉。华为的这种出事就甩锅，捂嘴第一名，连一根交通信号杆都要搞“封锁维稳”真的是让大家大跌眼镜。

2019年的新冠疫情，中共就是把甩锅展现得淋漓尽致，首先甩锅民众，说是由于民众乱吃野味导致的，接着又甩锅给美国，让民众开始恨美国，最后又甩锅给世界，中国已经清零了，可以复工了，再爆发都是由于外界的输入。疫情初期封口李文亮、方斌、张展，病毒泄露全球酿成数百万人死亡，中共不去正视疫情给全世界带来的灾难，而是一直洗白自己。疫情发生后，中共不顾科学、无视人权，以维稳为名，在全国实施极端封控，人民最终成为牺牲品，社会的活力也被摧残殆尽。

2026年9月，网上还流传一则问界准车主的说法：其因在社交平台抱怨交付方案和提车进度，被相关人员联系工作单位，要求删除内容。同样10月22日，搜狐汽车官方账号因发布问界爆燃事故相关内容，被禁言15天。华为的这种操作就是在控制舆论，掩盖真相。

中共也是这样，为了掩盖真相，人的生命在他们眼里好像一点都不重要，中共总是打着国家安全的幌子，封锁消息。六四屠杀，疫情封控等事件，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死亡，而这种死亡也是建立在他们暴力政权下的，在这样的独裁统治下，很多人都消息闭塞，知道的人不敢说，会被教训、被打压、被判刑，所以每一次的发声都会遭受到惩罚，中共试图将这些历史永久抹去。任何涉及高层腐败、宗教迫害、器官移植、疫情源头、经济真实数据等领域的信息，都被层层防火墙封锁、删帖、抓人、嘘声。中共创造一种社会，让所有人民都活在巨大的幻想中，连质疑的权利都被剥夺，只能接受中共所说的，中共希望你信什么，你就得信什么。

华为“251”事件是在华为工作12年的李洪元，离职后和公司谈妥了30多万元补偿，到账后就被华为举报为涉嫌敲诈勒索，遭羁押251天。华为简直妥妥的流氓行径。中共何尝不是这样，中共警察在执法中常常公然侵害人权，一副流氓嘴脸与行径。面对宗教信仰，中共把正常的信仰打成“邪教组织”，把信徒正常的聚会和传福音描述为社会威胁，一边打着宗教自由的幌子，一边又打压教会。“709”事件更让我们看到中共当局对维权律师侮辱、妖魔化，毫无廉耻地颠倒黑白和指鹿为马，将原本好好的律师，以人民的利益为主的律师，但却遭到中共乱扣帽子，很多失去了他们的执照，甚至被判刑。

这些年华为造了很多工业垃圾，但是他们却把营销绑架硬生生包装成爱国情怀，打着“你不买你就不爱国”的噱头，让人民为他们的劣质产品买单，活脱脱的道德绑架。在中共的统治下，当你不愿意为体制张扬喝彩，你就成了不爱国者；当你质疑国家的宣传真相，你就成了不爱国者；当你坚持说出事实，你就成了不爱国者。中共也是利用爱国情怀去绑架一代代的人民，让他们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华为是一个通过“盗窃、谎言和掩盖”运作的“犯罪企业”，长达约20年的模式化违法行为，包括敲诈勒索共谋、共谋窃取商业秘密、银行欺诈、电汇欺诈、违反伊朗制裁、洗钱及妨碍司法公正等。华为这些行径简直没有底线。同样，中共就是一个非常不守规则，没有契约精神的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中英联合声明》明确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保障言论、出版、集会和宗教信仰等自由，相关基本方针五十年不变。2020年北京实施香港国安法、随后改变议员资格规则。任何规则对中共都没有约束力，它会根据实际需求改变规则，并且找出各种理由为其无赖行径辩解。

华为的种种行径给我们看到它与中共如出一辙，把形象置于真相之上，把服从置于权力之上，把批评视为敌

意，把追责当作威胁。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和社会，应当是真实的，勇于接受批评与指正的，人民是受尊重的。



概念插画｜企业权力与信息透明主题

文中摘句

一个真正好的企业和社会，应当是真实的，勇于接受批评与指正的，人民是受尊重的。

贷款交社保？看中国社保现状危机

作者：卢超 | 翻译：戈冰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王滨 | 美编：冯仍

最近几则关于社保的新闻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湖北、广西、重庆等地的部分银行，陆续推出了诸如“社银贷”、“续保贷”、“渝保贷”之类的金融创新。其核心逻辑听上去十分荒诞：针对那些收入不稳定的灵活就业人员，如果手头紧交不起社保，可以向银行贷款交费；等到未来退休了，再从每月的养老金里按比例扣还本息。消息一出，舆论一片哗然，网友们苦笑着调侃这是名副其实的“借债养老”——还没开始享福，就已经把退休后的养老金提前预支交了利息。这场看似滑稽的金融操作，像一面刺眼的镜子，折射出了中国社保体系深层的制度性危机与底层焦虑。



随着零工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我国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人员、自由职业者和外卖骑手，面临着极其现实的生存困境。按照规定，职工养老保险需要累计缴费满15年才能领钱。对于体制外普通劳工而言，全额自负的缴费压力极为沉重。收入不稳定时，每个月固定的几百上千元社保费成了一座压在肩上的大山。“断缴”意味着前功尽弃，但咬牙坚持又会让眼下的生活陷入困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社保贷”粉墨登场，用“退休后再还钱”的缓兵之计，精准切中了这部分人既想保底又拿不出钱的无奈。然而，这种把“缴费压力”转化为“金融债务”的做法，无异于饮鸩止渴。

更为深刻的矛盾在于，人们不禁要问：社保基金为什么会缺钱到需要逼着底层借贷参保的地步？追根溯源，中国社保危机的核心根源在于体制设计上的严重失衡与长期积累的“养老双轨制”阵痛。

长期以来，中共推行的养老体系呈现出极度倾斜的“双轨制”特征。体制内的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以及国企高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几乎不用交一分钱社保，退休后却能领取占原工资80%甚至90%以上的高额养老金；而体制外占绝大多数的企业职工和农民，不仅需要承担高昂的缴费比例，退休后的替代率却低得可怜。哪怕后来出台了形式上的“并轨”政策，体制内人员依然依靠财政兜底的“职业年金”和极高的缴费基数，维持着高昂的退休待遇。人社数据显示，仅占领取养老金总人数极小比例的体制内退休人员，却分走了极其庞大的社保与财政养老支出；相比之下，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每月的养老金甚至仅够糊口。这种特权阶层吃大头、普通大众吃残渣的财富分配模式，造成了极其惊人的制度性亏空。

与此同时，中共过去在计划经济转型期留下的巨大“历史欠账”——没有将当年国企职工积累的资产及时划转做实养老账户，导致养老基金长期处于“用年轻人的钱养老人”的吃紧状态。随着人口老龄化浪潮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席卷而来，现役劳动力人口急剧萎缩，拿钱的退休老人大幅增加，地方财政无力继续大幅度转移支付补贴亏空，社保资金池的入不敷出便成了必然现象。为了维持这个庞大且向体制内严重倾斜的资金池不至于崩盘，官方只能想方设法拉更多体制外劳动者入局“开源”，这才催生出让老百姓借钱交社保的畸形产物。

把本应由公共财政承担的保障责任，强行捆绑上商业贷款利息，实则暴露出社会安全网在面对普通大众时的严重失能与冷酷。如果一个底层劳动者连当下的社保都交不起，未来又怎么可能指望那点被扣除贷款本息后所剩无几的养老金安度晚年?

社保的本质本该是转移支付、再分配与社会风险的兜底防线，而不是抽取底层血汗去供养特权阶层的工具，更不该变成一笔带有商业利息的个人负债。面对社保危机的深水区，如果不去触碰体制内特权养老金的巨额消耗，不去真正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而是把心思放在逼老百姓贷款

续保上，这场关于“老有所养”的时代大考，终究无法给公众一个交代。



文中摘句

如果一个底层劳动者连当下的社保都交不起，未来又怎么可能指望那点被扣除贷款本息后所剩无几的养老金安度晚年？

五中全会33名高官被开除党籍，反腐十多年究竟反出了什么?

作者：冯仍 | 翻译：戈冰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王滨 | 美编：冯仍

2026年10月29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在北京闭幕。新华社当天公布的会议公报，确认了中央政治局此前对33名高级官员作出的开除党籍处分决定，另外还有原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局长李云泽被撤销党内职务。



Attendants listen to Chinese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Day reception on the eve of the 77th founding anniversa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t the Great Hall of the People in Beijing, China September 30, 2026. REUTERS/Florence Lo/Pool

看到这份名单，确实让人感到吃惊。33人中有16人来自军队系统，另外17人涉及中央部委、地方政府、金融监管部门、军工企业和高校。这些人不是普通干部，而是曾经掌握重要权力的高级官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也有省委书记、部长和大型国企负责人。

军队系统被开除党籍的16人包括：张又侠、刘振立、王仁华、刘青松、黄铭、李桥铭、李伟、张红兵、汪海江、张林、王鹏、刘发庆、杨诚、钟绍军、赵晓哲、方永祥。

其他17人分别是：马兴瑞、蓝天立、刘建超、王莉霞、金壮龙、雷凡培、易会满、王祥喜、孙绍骋、费东斌、吴胜华、余剑锋、袁洁、张忠阳、温刚、金东寒、方红卫。

单从这份名单就可以看出，此次受到处分的官员涉及面之广、级别之高。特别是军队系统，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原中央军委委员刘振立，以及多个战区和军兵种的高级将领都在其中。这已经不仅是几名官员个人违纪的问题，而是整个干部选拔、管理和监督制度都值得重新审视。

习近平上台已经十四年了，反腐败几乎贯穿了他的整个执政时期。从最初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到后来不断强调全面从严治党，中共查处了一批又一批高级官员。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倒下后，还有更多省部级官员和军队将领陆续被查处。如今又有33名高级官员的开除党籍处分集中得到确认。

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中共反腐败搞了十多年，为什么高级官员还是接二连三地出问题？如果反腐真的取得了那么大的成效，为什么腐败问题似乎始终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些被查处的官员，当年又是谁提拔和重用的?

能够做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省委书记或者部长的人，不可能没有经过中共组织部门长期的考察和审核。他们的任命、晋升，也不可能脱离中共中央的干部管理制度。既然这些人能够一路升到如此高的位置，说明他们当年都曾经得到组织的信任和认可。可如今，他们又被同一个组织以严重违纪违法的名义清除出去。那么，当年负责选拔、考察和任命这些干部的人，是否也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

如果只是把责任全部推到落马官员个人身上，而不检讨整个选拔和监督制度，那么今天查处了33人，将来还可能出现新的33人。

特别是在军队系统，情况更加令人关注。此次被开除党籍的16名军队高级官员，涉及中央军委、战区、军兵种和军事管理部门。军队向来强调绝对忠诚和严格的政治审查，能够进入如此重要岗位的将领，理应经过层层把关。可这些经过多年培养和选拔的高级将领，如今又集中受到处分，至少说明过去的干部管理和内部监督存在需要解释的问题。

外界当然会怀疑，这些处分背后究竟有多少属于腐败案件，又有多少涉及中共高层内部的权力矛盾。仅凭目前公开的公报，还无法对此作出确定判断。但正是因为案件涉及如此重要的政治和军事人物，公众才更有理由要求有关部门公布具体事实，而不是只看到一份处分名单。

中共长期强调党的领导和内部监督，认为依靠自身的纪律检查和政治整顿，就能够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然而，

权力越是集中，监督就越容易受到限制。特别是当干部的政治前途主要取决于上级领导和组织决定时，下级官员往往更重视对上负责，而不是对社会公众负责。

这种权力运行方式存在一个明显问题：上级可以监督下级，但谁来有效监督上级？当监督权、任免权和重大决策权高度集中时，又如何防止掌握这些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中共一直强调自我革命，但一个政党是否能够依靠内部监督有效解决腐败问题，不能只看它查处了多少人，更应该看它是否建立了能够长期约束权力的制度。如果监督主要依赖领导人的意志，那么即使不断更换官员，也不能保证类似问题不再发生。

此次五中全会公报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只公布了33名官员被开除党籍的结果，并没有逐一公开这些人的具体违法事实和证据。外界知道他们被处分了，却不完全清楚每个人究竟犯了什么错误、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以及后续是否会受到刑事追究。

开除党籍是党内处分，并不等于法院已经作出刑事判决。对于涉嫌违法犯罪的官员，应该通过公开、公正的法律程序查明事实，依法追究责任。特别是这些曾经掌握重大公共权力的人，所涉及的案件很可能关系到公共资金、国家工程和行政决策，社会公众有权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

反腐败当然是必要的，腐败官员也应当受到法律制裁。但反腐败不能成为一种只由掌权者决定调查谁、处分谁，而社会公众无法进行有效监督的权力运行方式。否则，反腐败本身也会面临缺乏外部监督的问题。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社会，无论官员的职位有多高，都应该接受法律、媒体和公众的监督。官员涉嫌违法，应当由司法机关依法调查和审判；媒体发现权力滥用，应当有权进行调查报道；普通公民对政府官员提出批评，也不应该因此受到打压。

而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环境中，独立的新闻调查、民间监督和公众对高级官员的公开问责，仍然面临诸多限制。即使一些官员已经被查处，公众能够获得的案件信息也往往有限。这种监督上的不足，恰恰值得在每一次大规模反腐之后认真检讨。

习近平执政十多年来，一批又一批高级官员倒下，许多曾经受到重用的人最终成为被调查和处分的对象。中共可以将这些案件解释为反腐败取得的成果，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此多的高级干部接连出现问题，同样反映出干部选拔、权力约束和监督制度存在不可忽视的缺陷。

如果反腐败十多年后，还需要不断通过大规模查处高级官员来整顿党政军系统，那么真正需要反思的，恐怕不只是这些官员个人有没有问题，而是整个制度为什么不断产生这样的问题。

今天公布的是33人的名单，过几年又会是多少人？难道中国的反腐败，就只能这样一轮又一轮地持续下去？

我认为，中国真正需要的不是永无止境的政治整顿，而是能够有效限制权力、保障司法公正、允许新闻自由调查和公民监督的政治制度。只有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而不是让掌权者自己决定笼子的钥匙由谁保管，才有可能从根本上减少权力滥用和腐败。

33名高官被开除党籍，也许还会成为中共反腐败宣传中的一项成果，但这份名单同时留下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连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这样的高级官员都不断出现问题，那么究竟是谁在监督他们？又有谁能够监督那些掌握最高权力的人？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反腐败即使再持续十年、二十年，恐怕仍然难以摆脱今天这样的局面。

2026年10月29日于美国洛杉矶

编辑：黄吉洲 校对：王滨 翻译：戈冰

参考资料

1. 新华社：《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

2026年10月29日

https://www.xinhuanet.com/

公报全文：

https://www.12371.cn/2026/10/29/ARTI1793267034443539.shtml

2. 路透社：《China's Communist Party confirms expulsion of 33 officials》

2026年10月29日

https://www.reuters.com/world/china/chinas-communist-party-confirms-expulsion-33-officials-2026-10-29/

3. 新加坡《联合早报》：《刘建超、金壮龙等33人被开除党籍 李云泽被撤销党内职务》

2026年10月29日

https://www.zaobao.com.sg/news/china/story20261029-9916157

4. 台湾中央社：《中共20届五中全会落幕 增选张升民任政治局委员》

2026年10月29日

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10290320.aspx

本文提及的高官处分人数

33

文中摘句

如果只是把责任全部推到落马官员个人身上，而不检讨整个选拔和监督制度，那么今天查处了33人，将来还可能出现新的33人。

灵魂拷问：中共跨国镇压何时休?

作者：孙浩亮，Haoliang Sun | 翻译：戈冰 | 编辑：韩立华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近年来，中共针对海外民运人士及人权活动家的“跨国镇压”愈演愈烈。从“拆墙运动”发起人乔鑫鑫在泰国住所被秘密带走，到人权律师卢思位在老挝被强行遣返，北京的长臂管辖不断挑战国际法治的底线。而近期发生的中国民主党党员王君剑遭跨境绑架案，更是将这种肆无忌惮的恐怖政治推向了新的恶劣高度。 面对极权黑手在海外的疯狂蔓延，世人不得不发出灵魂拷问：中共的跨国镇压，究竟何时能休?

王君剑案的发生，是一起性质极其恶劣的法外绑架。这位长期旅居日本的异见人士，仅因在海外加入中国民主党、发表反对极权体制的政治言论，便成了中共处心积虑清洗的目标。2026年10月30日，当王君剑在中越边境的越南一侧送家人回国时，中共国安人员竟公然践踏他国主权，跨越边界将其强行掳走。目前，王君剑已被秘密押回国内，被长沙市国保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或“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黑箱羁押于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这起案件彻底撕下了极权体制伪装的“法治”面具，暴露出中共跨境打压手段的狠毒与升级。首先，它展现了“守株待兔”式的边境诱捕新特征，只要异见人士靠近中国边境，国安人员就敢在别国领土上直接抓人；其次，它暴露出中共对流亡人士出行动态的精细监控，王君剑原本在安全的日本生活，仅因一次前往越南的行程便落入陷阱；最恶劣的是，这种抓捕完全绕过了正当的国际引渡程序，性质等同于国际恐怖主义的政治绑架。

王君剑的遭遇，是近年来东南亚沦为中共跨国镇压“法外之地”的缩影。越南、老挝、泰国等国或迫于北京的政治经济施压，或通过黑箱操作的“执法合作”，频频默许甚至协助中共跨境抓人。这种对自由声音的疯狂堵嘴，恰恰暴露出中共对其政权合法性危机的极度焦虑。一个需要动用举国机器、跨越重洋、在别国领土上绑架一个手无寸铁异见者的政权，在道义上早已彻底破产。

面对极权长臂的步步紧逼，国际社会绝不能停留在口头谴责。联合国人权机构与相关国家必须严厉彻查并追究王君剑案中越方的黑箱责任；民主阵营必须升级法律防御机制，铲除极权体制在海外的代理人网络和非法执法据点。自由不容绑架，正义不容长臂。当世界不再对极权妥协，王君剑和无数被强行带走的先行者们，终将迎来重见天日的曙光。

文中摘句

> **自由不容绑架，正义不容长臂。**

国安法之刀：先香港，后澳门

作者：刘叶梅 | 翻译：戈冰 | 编辑：周志刚 | 校对：王滨 | 美编：冯仍

两天之内，香港判了黄之锋，澳门判了区锦新

摘要：黄之锋和区锦新接连被判入刑。港澳国安法已经进一步实施，港澳地区政治意见表达空间持续收缩，言论自由持续受到打压。

事情要连起来看，才看得明白。

11月5日，香港高等法院判黄之锋十年。罪名是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第二天，11月6日，澳门那边也判了一个人：前立法会议员区锦新，十二年六个月。

一个三十岁，一个六十九岁。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澳门。判决书一前一后，相隔只有一天。要说这是巧合，恐怕没人信。这更像是一个信号——这把刀，在香港用了六年，如今轮到澳门了。

黄之锋认了罪，还是判了十年

先说黄之锋这一宗。

他被指控的事情，发生在2020年7月1日到11月23日。说起来有点绕，其实内容很简单：他和已经流亡海外的罗冠聪等人一起，呼吁外国对中国和香港实施制裁。没有动刀动枪，没有伤人，没有什么秘密情报，就是公开喊话、游说、表态。放在很多地方，这叫政治表达；放在今天的香港，这叫勾结外国势力。

今年9月2日，他认了罪。按常理，认罪总该换一点宽大吧？结果呢，法官谭耀豪量刑的起点是十三年，认罪之后减到十年。而十年，恰好是国安法里“罪行重大”这一档的最低刑。也就是说，减无可减，法官给的已经是这一档里最轻的了——可还是整整十年。

更要命的是刑期怎么接。他从2020年11月被还押算起，已经在里面快六年了。初选案判的四年八个月，本来服到2027年1月就能出去，眼看只剩两个多月。可新判的十年，只有两个月零两天跟旧刑期重叠，剩下的要接着服完。这么一算，他得待到2036年底才能重获自由。那一年，他四十岁。

三十岁进去，四十岁出来。一个人的壮年，就这么交代在高墙里面了。

澳门这一刀，等了十七年

再看澳门。澳门的情况，其实更值得琢磨。

澳门的国家安全法，2009年就通过了，比香港早得多。可是通过之后，十七年，一次都没用过。澳门也因此落了个安稳的名声，常被拿来当“一国两制”的样板：你看，不抓人，不判刑，日子照样过。2023年，这部法律又修订了一次，罪名添了不少，口子开得更大。当时也有人担心，可澳门毕竟多年没动过这把刀，不少人觉得，修订也就是摆个样子。

现在，第一案来了，一出手就是十二年半。

区锦新这个人，在澳门政坛待了大半辈子，做立法会议员做了二十年。如今六十九岁了，判他的罪名有三项：颠覆国家政权、与境外组织保持联系危害国家安全，还有一项违反保密义务。刑期要到2038年1月29日才结束——到那时，他八十一岁。一个老人，这辈子还能不能走出监狱，谁也不敢说。

十七年不用的刀，第一次出鞘，就砍向一个在议会里坐了二十年的人。这说明什么？说明刀一直都在，只是以前没想用，或者说，没必要用。现在想用了，便是这个用法。

说到底，国安法已经沦为中国共产党惩处异议人士的工具。它收拾的不是什么危害安全的行为，而是立场——是那些敢批评、敢站在对立面的人的立场。

刀口对准的，一直是同一种人

把这两宗案子摆在一起，很多话就不用多说了。

黄之锋做过什么？呼吁制裁。区锦新做过什么？跟境外组织保持联系。一个在街头长大，一个在议会里老去，经历、年纪、做事的方式，没有一样相同。硬要找共同点，只有一个：他们都是当局眼里的异议人士，都是不听话的人。国安法惩罚一个人从来不是看他的行为有多危险，而是看这个人有多不顺眼。国际特赦组织这次的话说得很直白：国安法已沦为惩罚异议人士的工具。这话不是情绪话，是看着判决书说出来的。

还有刑期。呼吁几句，十年；联系往来，十二年半。这比不少伤人害命的案子判得都重。刑罚重到这个地步，图的就不是惩治已经发生的那点事了，图的是给旁人看：

看清楚了，这就是说话的下场。说穿了，重判本身就是一种警告，警告所有还在观望的人。

香港人对这一套已经不陌生了。2020年6月30日国安法落地，六年下来，报纸关了，团体散了，初选案里四十五个人被判颠覆国家政权，黄之锋也在其中。当年有人说，这部法律只针对极少数人。六年过去，“极少数”已经数不过来了。如今澳门补上第一案，版图又拼上了一块：先香港，后澳门，路数一模一样，只是时间早晚。

判决出来之后，外面的反应不小。人权观察说黄之锋这一判“残酷且不公正”；11月6日，欧盟和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十国发表联合声明，公开谴责。香港政府的回应还是那四个字：铁证如山。

铁证如山。这四个字，这些年听得太多了。证据到底在哪里，普通人看不到卷宗，也无从判断；能看到的，只有结果——一个三十岁的人要坐到四十岁，一个六十九岁的人要坐到八十一岁。

刀还在往下落。香港落完，澳门落。下一个地方、下一个名字会是谁，现在没人知道。只是照这个势头看，名单恐怕只会越来越长。

文中摘句

“三十岁进去，四十岁出来。一个人的壮年，就这么交代在高墙里面了。

香港 澳门

虚妄的宏大叙事与极权危机——从历史基因看中共统治合法性的破产

作者：张磊 | 翻译：戈冰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一、 现实困境与宏大叙事的破产

今日中国正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与信任赤字：言论自由受到严厉限制，异见者遭受高科技监控与打压；房地产低迷、地方债务高企与青年就业困难相互交织；司法缺乏独立性，“依法治国”在现实中不断沦为“以法治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方持续宣扬的“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套宏大叙事试图以国家崛起的集体荣光，掩盖民生困境与公民权利的缺失。

现实迫使我们追问：一个统治着十几亿人口的政权，其权力正当性究竟从何而来？当最高决策层不断犯下系统性错误时，人民是否拥有监督、纠错乃至和平更换执政者的权利？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重新审视中共的历史起源与百余年来权力演变的核心逻辑。

二、 历史基因：从革命夺权到毛时代的极权统治（1921—1976）

尽管中共信奉所谓的“枪杆子出政权”，但现代政权的正当性，不应建立在军事胜利或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占有之上，而应建立在人民授权、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之上。

1921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与支持下成立，其早期组织建设、意识形态与活动经费均高度依赖苏俄。此后，中共加入共产国际体系，并于1931年在江西瑞金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强行移植俄国政治模式，形成独立于当时中央政府的割据政权。

革命时期，中共通过“打土豪”、强行没收财产等暴力剥夺方式筹措经费，延安时期大规模秘密经营鸦片（隐称“特货”）充实财政等史实，进一步揭示了其筹款手段对基本伦理的践踏。从江西苏区“反AB团”肃反到延安整风，政治审查、逼供与思想改造不断强化组织控制，逐步形成党性凌驾于个人权利与基本人性之上的政治逻辑。

1949年建政后，中共迅速背离了此前关于民主自由与联合政府的承诺，确立了一党专政制度。随后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政治运动，伴随着绕过正当司法程序的公开处决与私有产权剥夺，传统社会伦理与自治空间遭受毁灭性打击。

1950年代末，“大跃进”及激进政策酿成了造成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的大饥荒。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与信息封锁，使重大决策错误长期无法得到内部纠正。至“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与阶级斗争被推向极端，社会信任、家庭伦理与基本法治秩序遭到严重破坏。

从革命时期的组织控制到毛时代的政治运动，其共同特征是权力不断集中于少数人甚至个人，而人民始终缺乏有效制约最高权力的制度性手段。

三、 制度转型与权力回归：改革开放以来的合法性危机（1976年至今）

1976年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共进行了权力再分配。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重大政策转向。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试图以经济发展与有限的制度调整重建执政基础。



1. “绩效合法性”与六四血案

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改善了人民生活，也为中共建立起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绩效合法性”。然而，经济发展并未改变权力的垄断本质。1989年，当学生与市民发起反腐败、争民主的抗议运动时，中共高层动用军队实施武力镇压，制造了血腥的“六四血案”。国家暴力对和平

诉求的碾压，彻底摧毁了其统治的道德正当性，更暴露出一党专政体制缺乏公开问责与和平纠错的制度缺陷。

2. 香港变局与“一国两制”的破产

香港回归前，中方曾向国际社会承诺维持原有制度与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动摇”。然而，《中英联合声明》随后却被中共外交部定性为“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的历史文件”。在2019年大规模“反送中”运动后，北京强推香港《国安法》，解散民主派组织，关闭独立媒体，限制新闻与言论自由。昔日东方之珠的彻底“内地化”与数十万居民移居海外，反映出缺乏权力制衡的极权体制对制度承诺的不可靠性。

3. 台海威胁与强权逻辑

台湾经过民主转型，建立了自由选举、政党轮替与宪政制度，证明在中华文化背景下完全能够实现民主政治。然而，北京持续强化常态化的军事威慑与政治施压，试图以武力威胁代替制度吸引力。这种依靠仇恨动员与武力胁迫维系的统一叙事，暴露出其统治伦理的贫瘠与对区域和平的严重威胁。

4. 疫情极端封控：治理神话的破灭

在三年的新冠疫情期间，权力不受约束的弊端被推向极致。官方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强行推行层层加码的极端封控：暴力焊死居民大门、强推全员强制接种、粗暴转运隔离病患、阻断基本医疗救援，酿成无数次触目惊心的人道主义悲剧。这一场权力不受监督的极端演练，彻底撕下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与“人民至上”的温情面纱，让全社会清晰地看到：在绝对的极权控制下，公民的生命尊严与基本生存权可以被任意剥夺。

5. 修宪集权与自我纠错机制的丧失

2018年，中共修宪取消国家主席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彻底打碎了改革开放以来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最重要制度遗产。随着权力高度集中于个人，集体领导与内部监督机制被摧毁殆尽。

制度最危险的时刻，不是领导人犯下错误，而是整个国家已彻底失去公开指出错误、追究责任并纠正决策的能力。

四、 结语：统治合法性的根本危机

纵观中共百余年历史，从依靠境外培植与暴力搜刮起家的早期史实，到毛时代数千万人丧命的人道灾难；从天安门的枪声打碎道德底线，到高压吞噬香港自由、武力威胁台海民主；从三年疫情期间将极端封控强加于人民的人道悲剧，到如今修宪集权、回归终身制——中共百年的历史向世人宣告了一个冷酷的真相：人民从来没有获得过自由选择的权利，而体制也早已切断了自我纠错的可能。

武力可以夺取政权，经济可以巩固政权，谎言与高压可以维持政权，却唯有人民基于自由意志的授权，才能赋予统治真正的正当性。当繁荣的神话破灭，当宏大叙事被现实刺穿，这个缺乏起源正当性、失去道德与绩效支撑，且彻底失去纠错能力的独裁政权，终将面临来自历史与人民的全面清算。

文中摘句

> **现代政权的正当性，不应建立在军事胜利或对国家机器的强制占有之上，而应建立在人民授权、权利保障与权力制衡之上。**

我们为什么反共?

——反对独裁更要警惕自己成为独裁者

作者：赵雪峰 | 翻译：周敏 | 编辑：Geoffrey Jin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摘要：真正有意义的反共，不应止于对某个政党的仇恨，而应源于对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坚定信念。反对独裁，更要警惕自身的专制思维。唯有尊重不同意见、坚持民主原则、摒弃双重标准，才能避免历史重演，让反抗暴政的努力真正通向自由，而非另一种专制。

我们为什么反共？这是一个看似简单，却值得每一位参与民主运动的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有人因为遭受过不公而反共；有人因为个人利益受到侵害而反共；也有人因为看到了中国社会的种种问题而选择反共；也有人为了留在文明社会而反共等等。这些原因都可以理解，但我始终认为，真正有意义的反共，不应该仅仅源于对某个政党的仇恨，而应该源于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与法治的认同。

我们反对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不认同其独裁统治，不认同其权力不受约束，更不认同人民缺乏自由表达和选择政府的权利。我们希望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有权利决定自己的未来。因此，我们反对的，不应该只是共产党，而应该是一切形式的独裁与暴政。

如果我们反对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却对普京对乌克兰人民的屠杀视而不见；如果我们反对中共的个人崇拜，却对金正恩的世袭统治保持沉默，那么，我们所坚持的民主原则究竟是什么?

民主价值观不应该有双重标准。不能因为某个独裁者与我们有共同的政治敌人，就选择原谅他的反民主行为。令人遗憾的是，世界上的独裁政权往往能够为了共同利益相互支持，而我在现实中看到的民运人士，却常常因为观点分歧而四分五裂。

现实中我们经常看到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有人高喊言论自由，却无法容忍不同意见；有人反对政治迫害，却热衷于辱骂、抹黑与自己立场不同的人；有人批评中共制造仇恨，自己却在网络上使用污秽语言，肆意攻击他人。只要别人提出不同观点，就被视为敌人；只要有人提出批评，就被怀疑动机，甚至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很多人即使到了海外，但其思维逻辑还是受“文革”思想残害至今。

当然，每个人都有选择交往对象的自由，也有权利屏蔽不愿接触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一边要求言论自由，一边又试图通过羞辱和抹黑让不同意见者闭嘴，那么，他所追求的自由，恐怕只是属于自己的自由。这让我不禁思考：有些人的反共，究竟是出于对民主价值观的认同，还是仅仅因为与共产党存在个人恩怨?

如果一个人反共，仅仅是因为自己不是共产党，那么他的反抗究竟是为了结束暴政，还是为了取而代之？斯大林反纳粹，但这依然不妨碍他大量屠杀苏联人民。

如果一个人在尚未拥有权力时，就已经无法容忍不同意见，那么当他真正掌握权力时，我们又凭什么相信他会尊重民主？中国历史已经给过我们太多这样的教训。历代农民起义，往往始于对暴政与不公的反抗，但旧政权被推翻之后，新建立的政权却常常重新走向专制。朱元璋出身贫寒，深知底层人民的苦难，但建立明朝之后，依然采取严厉的政治控制。太平天国以反抗清朝统治为起点，最终却建立起等级森严、高度集权的统治体系。

历史一次次提醒我们：推翻一个独裁者，并不意味着民主的到来。如果没有民主价值观和制度约束，今天的反抗者，明天也可能成为新的压迫者。因此，我认为海外民主运动不仅需要反对中共，更需要认真反思自身。

我们是否真正理解民主？是否能够尊重不同意见？是否愿意接受批评？是否能够放下个人恩怨，在共同的价值观下寻求合作？民主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需要身体力行的信念。它意味着宽容、克制、平等，也意味着即使面对自己不喜欢的人，依然愿意尊重他的基本权利。我们可以争论，可以批评，也可以彼此不认同，但不应该因为观点不同，就忘记了最初的理想。

我们追求的，不应该只是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而应该是一个没有独裁、没有政治迫害、人民能够自由表达、权力受到法律约束的中国。如果缺少民主价值观的支撑，即使有一天共产党不再执政，中国也未必能够迎来真

正的自由。因此我认为真正希望改变的，不仅是掌权的人，更是那个让暴政不断重演的历史循环。



概念插画｜自由与制度主题

文中摘句

反对独裁，更要警惕自身的专制思维。

失业的人还没找到工作，找钱的人已经找上门了，

作者：老默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早上醒来，先看手机。招聘软件没有新消息，昨天投出去的简历依旧没有回音。

吃过早饭，继续投简历。中午随便吃点，下午等电话。房租快到期了，银行卡里的余额越来越少。到了晚上，算一算这个月还剩多少钱，工作还是没有着落。

这时，社保的事找上门了。

人社部提出，要通过“数据找人”，识别尚未参保的人员，动员他们参加社会保险。

失业的人说，工作都没有，拿什么交?

2025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收益达到3906.72亿元，投资收益率为13.22%，累计投资收益超过2.29万亿元。

再看看退休以后。

在深圳、上海等发达地区，普通企业退休人员每月领取三四千元养老金并不少见；一些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加上职业年金，每月一万多元，甚至两万元以上。

在职时，有些岗位还有补充医疗、住房公积金、职业年金等福利。工资条上的数字，并不等于全部待遇。退休以后，基本养老金之外，还有职业年金等补充收入。

农村老人又是另一番光景。

很多人年轻时靠种地养家，没有单位为自己缴纳职工养老保险。年纪大了，主要依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每月领取几百元。有些老人还要种点地、打点零工，补贴日常开销。

他们并非没有参保，也并非人人没有其他收入。但年轻时缺少稳定的职工养老缴费记录，老了以后能领到的养老金，往往与职工退休待遇相差很大。

有人退休后每月领一两万元，有人领三四千元，还有人靠几百元过日子。

有人不是不想缴，而是眼下没有钱缴；有人不是不需要保障，而是忙了一辈子，能依靠的保障仍然有限。

失业的人还在等一份工作，种了一辈子地的老人还在盘算每个月的几百元。

数据找到了尚未参保的人。至于他们手里有多少钱，日子还过不过得下去，是另一张名单上的事。

当工作越来越难找，收入越来越难挣，普通人已经在为生计焦头烂额的时候，还要用越来越精准的技术找到他们、催促他们缴费——这种只看见缴费责任、却看不见生存困境的冷酷，才是整件事最令人不齿的地方。

文中摘句

> **这种只看见缴费责任、却看不见生存困境的冷酷，才是整件事最令人不齿的地方。**

一支烟头，一口黑锅

——从宏福苑大火的最终处理，看香港走上“中国式问责”的套路

作者：孔祥庆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李晶 | 校对：熊辩 | 美编：冯仍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爆发五级大火。一支烟头、一堆易燃杂物，烧了43个小时，8座楼烧掉7座，168人遇难（包括1名消防员），79人受伤——这是77年来香港最惨烈的火灾。

2026年10月，历时一年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交出最终报告，处理结果也随之落定。细看这一案，几乎是一份完美的“背锅学”教材。这也再次印证了一个冷酷的事实：香港已不再是那个法治与问责彰显的香港，而是日益融入中共治下大城市的行政逻辑与套路中。

一、 责任下沉：理想的“底层背锅者”

报告认定，火灾“最可能”由一根烟头点燃宏昌阁平台堆积的可燃物料引起。于是责任链条从下往上层层推演：扔烟头的工人——无姓名、无面孔，甚至始终未被确认身份；买了非阻燃棚网的二判商；应承建商“以免引起事故”的要求关掉消防总掣、连带关掉火警钟的电工；向消防假称“维修期间不会关警钟”的消防承办商；以及承建商宏业建筑的两名董事。

最终，7人及2家公司被起诉，罪名集中在“误杀”和“诈骗”。锅总有一个最合适的背法——顺理成章地落到一个具体的、低级的、甚至连名字都没有的基层人员身上。扔烟头的人堪称理想背锅者：他确实点了火，但没人知道他到底是谁。

二、 监管缺位：避重就轻的“意外事故”

然而，真正该承担监管职责的部门又在何处？这场大火本身是政府“强制验楼计划”派生的工程：2016年发令，2019年的验楼报告已明列外墙混凝土爆裂、钢筋外露等严苛问题，工程却拖到2024年才动工；名义上分三期，实际8座楼同时被竹棚和防火能力不合格的围网所罩。

劳工处连续收到居民16次关于工人吸烟的投诉，巡查16次却次次“没有发现”，既不发禁烟令也不发停工令，还与消防处踢皮球声称“公众安全不属我们管”；房屋局独立审查组指示承建商更换棚网后，从未查验新购围网是否阻燃，对承建商递交的伪造检测证书听之任之；烧楼那晚，政府斥资一亿建成的“手机紧急警示系统”更是一声不响。

面对这一连串的系统性失职与监管瘫痪，独立委员会的最终定性却轻飘飘地落在四个字上：属意外事故。

三、 官僚过关：“政治责任”的避风港

再看官方的后续处理：特首率官员鞠躬道歉，宣布“政治任命团队承担政治责任”。翻译成现实逻辑，就是由民选的业主立案法团和出资的1984户业主自己承受损失。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一人请辞，问责即止——而何永贤的任期本来就只剩三个月。

政府代表律师在总结陈词里直言：“没有客观证据支持政府人员和承建商串通，将责任全归咎政府是不公允”，并呼吁专业人士应该“自觉自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个组织联署为灾民发声的24岁大学生关靖丰，成了第一个被国安处拘捕的人；而那个所谓的“独立”调查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没有法定权力强制证人作供。“问责到底”喊了许久，宏福苑大火证明：所谓的“底”，不过是“政治责任”这块遮羞布。担下去的是形式上的责任，保住的却是实质上的权力。

四、 “中国式问责”在香港的复制

纵观调查时长、报告定性与后续处置，这套操作展现出极其熟悉的“中国式问责”逻辑：责任可以归咎于任何基层个体，实在不行找个替罪羊，而最不可能承担实质责任的就是各级政府与官员。其核心逻辑在于维持官僚体制的“伟光正”形象，绝不进行深层的体制反思与根本道歉。

这种“避重就轻、政治洗牌”的案例在大陆比比皆是。例如震惊中外的三鹿毒奶粉事件中，多名被问责下台的官员随后纷纷复出或异地升迁：前河北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后任河北省政府党组成员；被处分的孙咸泽此后升任国家食药监总局副局长；被问责的王智才亦复出担任农业部总畜牧师。这种“问责-避风-复出”的循环，正是该体制下固有的政治惯性。

结语：法治沦丧与制度侵蚀

宏福苑大火的处置，将体制的冷酷展现无遗。高官免于实质追责，基层沦为背锅工具，发声者反被收监。这不

仅是对168条生命的漠视，更是对香港以往引以为傲的法治精神与制度尊严的沉重打击。

一支烟头，一口黑锅。当行政权力的自我保护凌驾于公众利益与法治之上，留在历史记录里的，终究只剩下一声叹息。



概念插画｜责任归属主题

文中摘句

面对这一连串的系统性失职与监管瘫痪，独立委员会的最终定性却轻飘飘地落在四个字上：属意外事故。

姆巴佩伤害的是共产党的感情，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作者：余茂春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李晶 | 校对：周敏 | 美编：冯仍

这几天大家可能都在想，到底是谁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今天，我也来说说自己的看法。

事情起源于法国足球巨星姆巴佩（Kylian Mbappé）最近惹恼了中共。因为他说毛泽东是个独裁者。北京立刻火冒三丈，指责他“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是，毛泽东本来就是独裁者，他的统治造成数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难道说出这个历史事实，比毛泽东当年害死那么多中国人，更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件事看起来荒唐，却正好戳破了中共多年来惯用的一套政治把戏。只要有人批评共产党，就说人家侮辱了中国；只要有人批评毛泽东，就说人家伤害了中国人民。毛泽东虽然已经死了半个世纪，但他留下的独裁体制还在，中共对毛的政治遗产更是碰都不让人碰。

“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这句话，大家应该早就听腻了。美国总统见了达赖喇嘛，中国人民的感情受伤了；日本首相谈到台湾，中国人民的感情又受伤了；外国政府批评中共迫害人权，中国人民的感情还是受伤了。

奇怪了！十四亿中国人真的都这么容易被伤感情吗?更重要的是，谁问过他们?

一个不让人民自由选举国家领导人、不准人民公开批评政府、连上网说几句真心话都可能惹上麻烦的政权，居然一天到晚宣称自己最了解全体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不是很可笑吗?

其实，这套说法已经用了几十年。中国媒体研究计画（China Media Project）发现，早在1959年，中共《人民日报》就在中印边界争端中拿“伤害中国人民感情“来指责印度。研究人员统计了1959年至2015年间《人民日报》的143个相关案例，发现中共用这句话骂得最多的是日本，其次是美国，而台湾和西藏问题也经常成为引爆点。

说穿了，只要有人碰到中共的政治利益，或者不接受它对历史和领土的说法，中国人民的感情就会突然受到“严重伤害“。

最离谱的例子之一，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当年中共出动军队镇压屠杀要求民主改革的中国民众，美国国会对这场血腥镇压提出谴责。结果北京竟然反过来指责美国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 这是什么道理？杀害中国人民不算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谴责杀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反倒成了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罪过?

这就是中共这套说词最荒谬、也最虚伪的地方。 毛泽东搞大跃进，造成一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大饥荒，估计有三千万到四千五百万中国人因此丧命。接著又搞文化大革命，整个社会被折腾得天翻地覆。无数家庭被拆散，老师被学生批斗，知识分子遭到迫害，寺庙古蹟被砸得乱七八糟。到了1989年，中共又在北京向自己的人民开枪。

中共治国无方，折腾有数。目前的中国，民不聊生，失业飞涨，就业艰难，人人思润，万众躺平，遍地贪腐，无限监管，镇压空前。难道因此而受煎熬的亿万中国人民的痛苦就不算数？难道这些事情没有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

可是，中共偏偏不准这些人公开诉说自己的苦难。谁想追究责任，谁就可能受到打压；谁想纪念历史，谁就可能被当成政治上的寻衅滋事的人物。

所以，中共口中的“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实有一个很奇怪的规矩，只要是外国人让中国人不高兴，中共就要替大家出头；但如果是共产党自己伤害了中国人民，那就最好闭嘴，连提都不准提，因为在中共眼中， 被肆虐几十年的中国人民是没有感情的。

姆巴佩事件就很能说明这种荒唐的地方。中国媒体忙著谴责他的所谓“辱华“言论，却不敢清楚告诉中国民众，他到底说了什么。有些中国网民连事情的来龙去脉都不知道，就被要求跟著生气。连别人讲了什么都不让你知道，却要你义愤填膺，这不是很滑稽吗?

这种愤怒，很多时候根本不是人民自己产生的，而是中共需要人民生气的时候，才刻意制造出来的。

这套把戏其实很好懂。对内，中共可以把老百姓对经济、失业、贪腐和社会不公的不满，转移到外国人身上。对外，则可以利用庞大的中国市场，逼外国政府、企业、学校、运动员和演艺界人士乖乖接受中共的政治规矩。

2019年，美国职篮休士顿火箭队总经理莫雷（Daryl Morey）发文支持香港示威者，北京马上对NBA展开抵制。其他外国企业和名人，只要在台湾、西藏等问题上说了中共不爱听的话，也可能遭到封杀。

北京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你在美国可以有言论自由，但如果想赚中国市场的钱，就得先学会看共产党的脸色。这其实就是拿生意当武器，逼自由世界接受中共的言论审查。

但是，中共这种动不动就发火的习惯，也暴露出它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

在台湾问题、美国军事行动，以及其他国际争端上，北京经常把话说得很重，动不动就警告对方要承担“严重后果“。但很多时候，最后也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嘴巴上喊得震天响，真正能做、敢做的事情却未必有那么多。

中国当然是一个有实力的大国，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一个真正有自信的大国，何必整天为了外国人的一句话、一张地图、一个玩笑，就气得跳脚？ 一方面宣称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正在实现伟大的民族复兴；另一方面又把中国人民说得好像玻璃心一样，动不动就被外国人伤害。这两件事摆在一起，不觉得很矛盾吗?

说到底，中共真正害怕的，不是中国人民的感情受伤，而是有人不再把共产党当成中国的唯一代表。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共特别喜欢拿中国近代史上的屈辱做文章。 十九世纪以来，中国确实受到过列强侵略、不平等条约，以及日本军国主义带来的巨大灾难。这些历史都是真的，也值得中国人记住。但问题是，中共只准中国人记住外国人对中国造成的伤害，却不准中国人自由讨论共产党自己造成的灾难。

外国人一百多年前犯下的前科，北京可以没完没了地要求道歉；共产党对中国人民造成比外国人所为多出几十倍的数千万人死亡的历史，却连公开追究都不准。这根本不是尊重历史。

只要国内经济出了问题，社会矛盾增加，或者人民对政府不满，北京就可以找个外国人来当出气筒，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捍卫民族尊严的大英雄。这套政治操作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故意把共产党和中国画上等号。

但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两者根本不是一回事。

对美国人来说，这件事其实有一个很直接的教训，不要再为了行使自己的自由，而向独裁者低头道歉。北京没有权力规定美国人能说什么、大学能教什么、企业能发表什么，更没有资格决定哪些历史事实可以公开讨论。

中共现在很聪明，它不需要在美国制定法律，只要拿中国市场当诱饵，就能让不少美国机构自己替它执行言论审查。好莱坞为了中国票房修改剧本，大学怕惹北京不高兴而迴避敏感议题，企业为了生意限制员工发言，体育联盟更是动不动就为一句完全合法的政治言论公开道歉。

这才是美国人真正应该警惕的事情。一个外国独裁政权，居然可以利用商业利益，让自由社会的人自己放弃言论自由。这不是一般的外交摩擦，而是中共把自己的政治规矩一步步带进美国社会。

我们应该公开揭露中共的经济胁迫，保护因为合法言论而遭到北京报复的美国人，并且清楚告诉北京，中国市场再大，也买不到替美国人制定言论规则的权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看穿中共最大的政治谎言， 强调共产党不等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也不等于中国人民的利益。

真正侮辱中国人民的，不是有人说毛泽东是独裁者，而是一个造成数千万中国人死亡、掩盖历史真相、剥夺人民基本自由的政党，居然还厚著脸皮，自称是中国人民感情的守护者。

北京与其整天教训全世界不要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不如先向中国人民交代，共产党自己到底给他们造成了多少苦难。 说穿了，中共根本不是在保护中国人民的感情，而是在拿中国人民的感情当人质。真正伤害中国人民尊严的，不是外国人批评共产党，而是共产党自己。

习近平担忧的互联网执政关，可能正是变革的突破口

作者：小舞（@reporterxiaowu）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李晶 | 校对：周敏 | 美编：冯仍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当习近平亲自把互联网治理与共产党的长期执政联系在一起时，这句话其实已经点明了互联网在中共政治安全体系中的特殊位置。对他们而言，这是事关执政周期的命门；而对我们而言，也由此看见了这个看似强大巨人的阿喀琉斯之踵。

所谓“长期执政这一关”，已经是习近平相当委婉的说法。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共产党能否继续掌握国家政权，会不会有一天失去执政地位。

那么问题来了：一个看上去如此强大的政权，拥有超过一亿党员，对社会的控制深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又筑起了世界上规模庞大的互联网审查与封锁体系，为什么它的最高领导人仍然如此在意“互联网这一关”，甚至把它直接提升到能否“长期执政”的高度？

如果互联网只是一种传播工具，为什么会被置于政权存续的尺度上衡量？如果现有的控制体系已经足够牢固，又为什么需要不断强化网络审查、舆论引导和信息封锁？

习近平的这句话，无意间提出了一个比答案本身更值得追问的问题：互联网究竟拥有怎样的力量，以至于一个拥有庞大组织体系和严密社会控制能力的执政党，仍然把能否驾驭它视为关乎长期执政的一道关口？

从习近平长期、反复强调“互联网这一关”这个细节可以看出，这并非一次会议上的偶然表态，而是被持续置于中共执政安全的框架中加以强调。至少从他的公开表述来看，互联网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或传播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党内长期保持警惕的政治问题。

当一个最高领导人反复把互联网与“长期执政”联系在一起时，其中传递的政治信号已经十分清楚：互联网这一关不能失守。因为在这种政治逻辑之下，失去的可能不仅是网络舆论的控制权，还可能进一步触及执政安全本身。

也正因此，“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值得反过来理解：习近平是在反复提醒他的党内同志，必须牢牢控制互联网，决不能让它成为中共长期执政的致命软肋。

习近平所担忧的软肋，也可以成为我们突破铁幕的另一个方向。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一百多年前的晚清。改变中国的政治格局，不可能简单复制一次武昌起义，更不可能寄希望于传统意义上的武装暴动。一个最现实的事实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反共人士和民主力量，既没有条件，也没有能力组织一支足以与中国庞大的现代化军事和国家机器相抗衡的武装力量。

与此同时，如果政治行动长期停留在中共驻外使领馆门前举牌、喊口号，其传播范围和实际影响也十分有限。抗议当然具有表达立场、凝聚群体和保存历史记录的意义，但如果希望让更多中国人接触未经官方筛选的信息，仅靠线下活动远远不够。

现阶段，能够跨越地域边界持续发挥作用的工具之一，就是互联网。

它不要求人们拥有军队，不需要占领一座城市，也不以暴力作为传播思想的前提。文章、图片、视频、直播和社交媒体，可以突破地理距离，把原本彼此孤立的人连接起来，让被删除的信息重新出现，让被禁止讨论的问题继续被讨论，让官方叙事之外的声音获得传播空间。

对于一个长期强调舆论导向和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政治体系而言，互联网带来的重要变量，就是信息传播权力的分散。

过去，报纸、电视、广播、出版社构成的信息传播体系高度集中。一件事情能不能报道、如何报道、报道到什么程度，都存在明确的把关机制。从记者、编辑到总编，从媒体机构到宣传主管部门，信息必须经过一道又一道“闸门”。在这样的传播结构下，一份指令、一个电话、一纸通知，就足以让一条新闻从报纸版面、电视画面和公共视野中消失。

互联网首先改变的是信息传播的权力结构。过去只有少数机构掌握的麦克风，被分散到了无数普通人手中；过去需要经过层层审核才能抵达公众的信息，现在可以由一个身处现场的普通人，用一部手机、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在极短时间内传播出去。

更重要的是，权力可以删除一篇文章，可以让一段视频消失，可以封禁一个账号，却越来越难保证所有人都没有看见过它。

即便中共建立包括网号、网证在内的网络身份管理制度，拥有庞大的内容审查体系，又用防火墙阻断大量境外信息进入中国，只要中国仍然接入国际互联网，互联网互联互通的基本属性就很难被彻底消除。封锁可以增加获取信息的成本，审查可以压缩表达空间，却很难保证所有信息都被永久隔绝在边界之外。

信息突破，让被封锁的消息仍有机会穿透审查；议题设置，让普通人可以提出官方媒体不愿提出的问题；身份连接，让原本互不相识、散落各地的人因为共同关注的议题彼此发现；公共动员，让线上讨论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中的公共参与；而对官方叙事垄断的削弱，则意味着一个政府越来越难仅仅依靠控制传统媒体，就决定整个社会能够看到什么、讨论什么以及相信什么。

信息突破、议题设置、身份连接、公共动员、叙事竞争——互联网把这些过去难以由普通人同时掌握的能力，大规模分散到了社会之中。

也正因为如此，中共面对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从来不只是“管理网络”，而是在互联网改变信息权力结构之后，试图重新建立一道又一道被技术冲开的闸门。

那么，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答案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制造虚假信息，更不需要用谣言对抗审查，只需要做好四件事情：

记录、核实、保存、传播。

文章可能被删除，就保存底稿；网页可能消失，就及时存档；图片和视频保留原始文件；重要材料建立包含时间、地点和来源的完整证据链；一个平台无法继续保存，就在其他合法平台留下副本；国内无法长期存在的重要公共资料，就进行境外和离线备份；面对真假混杂的信息，先核实，再传播。

目的只有一个：让事实越来越难以被彻底删除，让公共记忆不再随着一个又一个“404”消失。

删除仍然有效，却越来越难以等同于彻底消失；封锁仍然可以筑起高墙，却越来越难以保证墙的另一边永远无人看见。

如果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己记录事实，如果被删除的文字能够重新出现，被封锁的信息能够跨越边界，被遗忘的人和事件能够重新进入公共记忆，那么，一个高度依赖信息控制维持自身叙事的治理体系，还能不能永远把“互联网这一关”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

或许，互联网给我们的，正是将铁幕撕开一道缝隙的可能。

不是用谎言对抗谎言，不是用暴力回应暴力，而是让真实的信息持续流动，让被删除的事实重新出现，让被噤声的人重新获得表达的机会，让原本彼此孤立的人能够看见彼此。

以真实对抗封锁，以记录抵抗遗忘。

我们无法决定一条信息最终能够走多远，也无法预知互联网究竟能够给中国带来怎样的政治变化。但至少可以让更多真实的记录留下来，让越来越多的人拥有接触不同信息、独立判断和自由表达的机会。

“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习近平是在提醒他的党内同志，而对于所有关注中国政治变革的人来说，这句话还有另外一面值得思考：

当信息开始突破边界，当记录不再能够被轻易抹去，当越来越多的人重新获得记录、传播和表达的能力——

“互联网这一关”，会不会成为变革的突破口？

那堵墙，与这堵墙

作者：赵志伟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胡丽莉 | 校对：王滨 | 美编：冯仍

三十七年前，柏林墙一个晚上就倒了；中国的墙却越修越高

摘要：柏林墙倒塌源于民众对自由的追求，而中国的网络防火墙却不断加高，封锁信息、压制言论，将民众与外部世界隔绝。

1989年11月9日夜里，东柏林的检查站，边防军抬起了栏杆。没有上级命令，就是抬起来了。一小时里有两万人走过桥。西柏林的人站在桥那边，递香槟、递花，陌生人抱在一起哭。这堵墙已经立了二十八年，倒下只用了一个晚上。

墙是怎么倒的？1989年秋天，莱比锡每个星期一都有人上街，举着蜡烛，就这么走。9月一千人，11月四十万人。10月9日那天七万人上街，现场有八千名武装人员，没有人开枪。11月9日，官员在记者会上说错一句话，新旅行规定“立即生效”。四天里，四百三十万东德人涌入西德。墙不是被坦克推倒的，是被走路的人推倒的。

今年11月9日，墙倒了三十七年。柏林只剩下一段墙当遗址，供游客拍照。中国的墙却还在，而且越修越高。它不是砖头砌的，是代码砌的，名字叫防火墙。墙倒不倒，不取决于墙有多高，取决于墙里面的人。

很多中国年轻人长这么大，没用过谷歌，没看过脸书，不知道维基百科长什么样。墙对他们来说不是墙，是世界本来的样子。防火墙挡住的网址有十四万多个。墙是一年一年长起来的：脸书和X是2009年被封的，谷歌是2014年，维基百科2019年被全部封掉。很多人每天的第一件事，是打开VPN，看看今天能不能连上，能连上是运气，连不上是常态。去年八月，有一天夜里，全国连往境外的网断了七十四分钟。我写这篇文章，查资料用的全是墙外的网站。墙里的人想写这样一篇文章，连资料都查不到。

翻墙是有代价的。上海有人因为翻墙被罚三千块，广东有人被拘留十五天。这还只是轻的。律师谢阳今年三月被判五年，法院将他在微信上发表的多条言论作为判决依据。写给朋友看的话，成了判刑的理由。微信是私人地方，朋友之间说的话，墙连这个都听得见。记者张展因为在推特和YouTube上发帖，去年九月又被判了四年。河南的贾楹因使用VPN登录Facebook、Twitter等境外社交平台发帖，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四年有期徒刑，今年9月刚刚刑满释放。

香港以前是墙外面的。报纸敢骂，游行敢走，谷歌随便用。2020年国安法之后，墙修到了香港。2024年3月，香港通过了23条，最高可以判终身监禁。47人案里，四十五个人被判四年多到十年的刑期。黄之锋这个月刚被判十年，黎智英今年二月被判二十年。墙不是静止的，它会长。一堵墙立起来的时候，当权者总说是为了防外面的敌人。可墙修好之后，枪口永远对着里面。

更多的人没有被抓，只是学会了不说话。父母教孩子网上什么话不能说，老师教学生什么文章不能写。墙不用派人看着，每个人都成了自己的看守。柏林墙倒下的时候，东德人还记得墙外面是什么，他们能收到西德的电视，还有西边的亲戚，墙再高也挡不住记忆。中国的墙立了二十多年，一代人长大了，他们对墙外没有记忆，也就没有什么要翻过去的。第一代翻墙的人还记得墙外面有什么，第二代连墙都看不见了。第一代人是害怕，第二代人是习惯。害怕的人还知道自己在怕，习惯的人连怕都忘了。柏林墙是把人关在墙里，中国的墙是把墙修进人心里。

没有人能预测墙倒在哪一天。等到的时候，只用了一个晚上。中国人呢？墙里面的人，有人翻墙，有人沉默，有人已经忘了墙外面还有世界。三十七年前，东柏林的人用脚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的答案，还没有写出来。

盼着习近平退位，不如盼着共产党倒台

作者：张滨滨（X@reporterxiaowu） | 翻译：周敏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临近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关于习近平是否功成身退的猜测又多了起来，好事者甚至通过观察七名政治局常委进入会场时的间隔距离来猜测，习近平已经钦定了“皇储”李强，在明年秋天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上就将正式上位，而悬念只是在于习近平到底是像他的前任胡锦涛一样“高风亮节”直接裸退，还是像胡锦涛的前任江泽民那样保留军权对新上位的总书记“扶上马再送一程”。

说实话，对于中共这样的宫闱秘政操作，外界的任何猜测和解读实际上都不能算是离谱，毕竟除了身处其间的中共高层之外，没有谁能具体掌握他们的实锤信息。特别是事关习近平退休这样的高度机密，除了捕风捉影之外，政治分析人士也着实没有太多渠道，正因如此，一定程度上也给了听床师傅们想象和自由发挥的空间。

这样也好，共产党越是严肃越是高深莫测，佐以听床师傅的戏谑，反倒是给了我们这些日子过得本就苦哈哈的普通人一些乐趣，有时候用荒诞解构严肃可能还真是一种好主意。

当然，我们还是寄望于观察家们能够穿透迷雾，在繁杂的人事关系中为我们梳理出最接近真相的那些异动，比如，习近平会不会退位？谁又将接班？毕竟，共产党的颂圣歌曲就一直传唱“让我告诉未来，中国进行着接力赛”，强大如习近平这样的独裁野心家，终有老去的那天，没人希望他在赛道上一直跑到生命尽头，最起码这也不够人道。

在我看来，时下谈论习近平退位大家的迫切心情可以理解，但一眼望去，实际上现有的政治局班底并不具备接班人，这也就意味着，在明年的二十一大上，习近平交棒的可能性就不会存在，即便你不愿意，届时二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的新常委见面会上，习近平还是会说出那句“全会选举我继续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转过年，继续配齐“三位一体”。

实际上，这并不难以理解，政治局班底构架不具备潜在接班人选，加之修宪带来的制度性障碍已经清除，既然背负了千古骂名，多干一届和多干两届区别也不大，习近平没有理由不继续自己的“独角戏”，至少，“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还只能持续“特色”无法进化为“习近平思想”之前，可能就不存在退休的可能性。

在中共党内，习近平已经不是一般的总书记，而是划时代的绝对核心，以中共党史为参照，毛泽东凭借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了核心地位，邓小平主导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奠定核心，习近平藉着2021年11月11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开创了“新时代”。

“十八大以来”已成中共叙事定语，而习近平本人，则是新时代新征程需要锚定的绝对核心，是需要全党维护的“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说不上前无古人最起码是后无来者的历史定位下，中共党内谁又敢提交棒接班谁又敢提核心退位？

特别是在“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已成未来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重要议题的背景下，主动触及这个话题无异于自杀，习近平能不能退休暂且不论，蠢蠢欲动的接班人就先被以反腐之名拿下了。

有分析认为，即将提交二十届五中全会讨论的《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对习近平新时代执政成就的盖棺定论，在我看来实则不然，这份决定更可能是将习近平推升到新的历史定位的助推器，以便他可以继续执政长期执政，如若不然，当初违背民意违背党内共识推动修宪的意义又何在呢？

其实，早在习近平新时代开启之前，任剑涛教授就曾经预言，中国即将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状况是，要进入一个毫无生气的二十年。因为这两代人都是红卫兵、红小兵出身，而红卫兵、红小兵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规则。他表示，像50年代和60年代这两代人基本上是在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教育下和熏陶下，走向高中毕业。在大学的时候，基本上是在恢复共产党的权威，没有接受到真正的现代严格的知识训练，很难有现代观念。因而他们无法把一个制度的权威和人格的权威清晰的区别开来。

毫无疑问，习近平退位当然是民心所向，但从任剑涛预言的这个层面来看，未来的中共总书记是习近平还是李强或者其他人，可能对中国未来走向的改变并不是那么值得期待，预期盼着习近平退位，不如盼着共产党倒台。

几千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无时无刻不在期盼明君，总是认为出个好皇帝大家的日子就好了，如今共和百年了，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心态。辛亥革命之后中国确实没有了皇帝，但1949年之后，共产党这种党内继位的传承制度比起皇帝的家传承制度进步了吗？改变了吗？可能有一点，但不多。

在习近平新时代之前，我们还可能透过储君配置提前观察未来动向，到了习近平这里，中共的接班人序列已经被打乱了，储君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真正把共产党打造成了宫闱秘政，持续下去，没准哪一天我们又要回到去正大光明匾后面去找遗诏确认中共接班人了。

文中摘句

> **预期盼着习近平退位，不如盼着共产党倒台。**

在罗德岛悼念一位法官，回望故土的司法之痛

作者：杨大鹏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去罗德岛悼念卡普里奥法官，对我而言，也是一次回望。这位曾在普罗维登斯市法院工作的老人，于2025年8月20日离世。他留给许多人的记忆，是法庭上的温和、耐心，以及对普通人处境的体谅。罗德岛州政府在悼念声明中，也特别提到了他的温暖与同情心。（罗德岛州政府悼念声明链接https://governor.ri.gov/press-releases/governor-mckee-issues-statement-passing-judge-frank-caprio。）我平时看过很多他的视频，隔着屏幕，我常常感到暖心：一个人走进法庭，面对掌握裁决权的法官，仍然可以得到尊重；生活中的窘迫，可以被耐心听见；法律的严肃，也可以通过平静而有分寸的方式表达。真正打动我的，是他愿意把当事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案卷和罚单之外，每个人还有自己的生活，有需要承担的责任，也有难以对外人说清的艰辛。可每当这种温暖涌上心头，我又会想到自己曾经生活过的中国，想到那片土地上关于司法的种种沉重词语：有案不立、久押不决、人情案、关系案。一个人究竟要经历多少失望，才会觉得，能够在法庭上把话说完，已经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法院的大门，为什么会成为一道门槛

司法应当为受侵害的人提供救济。发生纠纷，可以寻求裁判；遭到指控，可以进行辩护；受到错误处理，可以要求纠正。这些本应是公民能够依法行使的权利。然而，有案不立使人连争取裁判的机会都难以获得。材料可以一再准备，窗口可以一再往返，时间和积蓄却经不起无限消耗。当一个人被挡在程序之外，他所承受的伤害，也会因为缺少救济而继续扩大。久押不决则使等待本身成为惩罚。在判决作出之前，一个人的工作、家庭关系与生活秩序，就可能已经遭到严重破坏。即使后来获得纠正，那些失去的日子也无法原样归还。办案机关眼中的一段流程，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就是不可重来的生命。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更进一步侵蚀了司法的根基。证据与规则一旦让位于关系、利益或者上级的意志，普通人便不得不面对一种令人屈辱的现实：能否得到公正，似乎取决于自己认识谁、能够找到谁。当人们遇到纠纷，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司法的公信力就已经受到了伤害。

这些问题也并非仅仅来自外部批评。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的相关报告明确提出整治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官方公布的政法干警禁令，也列出了有案不立、压案不查等行为。这至少说明，这些弊病是官方自己承认需要面对的问题。（点击查看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报告、政法干警“十个严禁”）

比个别贪腐更需要追问的，是权力如何受到约束

批判中共治下的司法腐败，不能停留在要求查处几个收钱办案的人。受贿当然应该追究，但司法遭到扭曲，也可能发生在没有金钱交易的时候。一个电话、一项内部要求、一种需要法官揣摩的政治意图，都可能对裁判形成压力。因此，更根本的问题是：当权力试图影响案件时，法官能否拒绝？当案件涉及有势力的人或机构时，当事人能否获得同等的程序保障？当司法机关自己犯错时，纠错能否免于内部利益的阻碍？中共的政法体系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官方的政法干警要求中，也明确表达了对西方式“司法独立”的否定立场（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相关要求）。这使一个矛盾无法回避：当政治领导的要求与具体案件中依法裁判的要求发生冲突时，究竟由什么机制确保公民权利不被牺牲？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能只有纪律教育、内部监督和整治口号。公众需要能够实际使用的保障：立案有明确规则，羁押受到有效审查，辩护能够充分进行，裁判说明理由，干预司法能够被追究。缺少这些约束，公正就容易变成一种依赖个人品格的偶然。一个好法官或许能帮助一些人，却难以独自抵挡整个权力结构带来的压力。

我们需要善良的法官，也需要可靠的制度

我知道，网上传播的庭审片段，无法代表美国司法的全部。一位令人敬重的法官，也不能证明一个国家的司法已经没有不公。我同样不会因为批判中国的司法问题，就否认其中存在认真办案、愿意维护当事人权利的法律工作者。恰恰是这些人的存在，让制度上的问题更加值得追问：他们坚持原则时，究竟得到多少支持，又需要承担多少压力？卡普里奥带给我的启发，在于权力可以怎样对待一个普通人。法官的权威，不必靠羞辱当事人来建立；法律的尊严，也不必靠漠视人的困境来维持。当然，司法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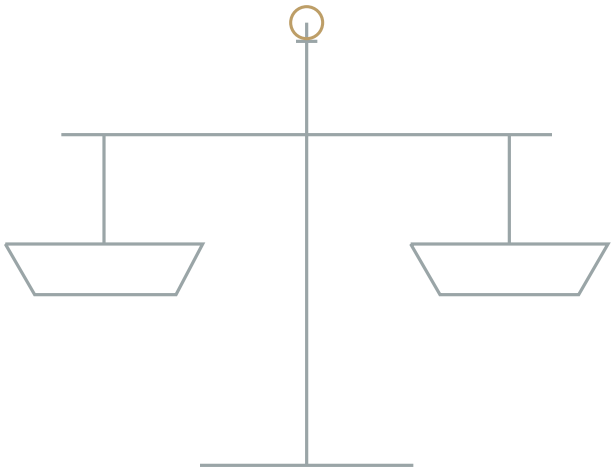
的体谅也应当有规则和理由。同样处境的人，应当获得同样的尊重；没有镜头记录的人，也应当享有完整的权利。我们期待的公正，必须超越某位法官一时的善意，成为每个人都能够要求、也能够追索的制度承诺。一个人不该因为贫穷而失去被听见的机会，不该因为没有关系而被挡在门外，更不该因为质疑权力，就失去法律的保护。

悼念，也是对故土的一种牵挂

去罗德岛悼念卡普里奥，我心里有敬意，也有悲凉。敬意来自他让许多人看见了司法温暖的一面。悲凉则来自对故土的牵挂：为什么那些原本朴素的期待，在一些人那里，会变成耗尽多年人生也难以实现的愿望？我批判中共司法体系中的腐败与权力干预，因为每一种抽象弊病背后，都可能是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所谓久拖不决，是有人一天天等不到答案；所谓关系办案，是有人拿着证据，却抵不过别人背后的势力；所谓纠错困难，是有人明明已经承受了伤害，还必须继续证明自己的伤害值得被承认。这些人的命运，不应该被一句“情况复杂”轻轻带过。纪念一位法官，最终也让我重新思考：我们应该怎样衡量司法的文明程度？在我看来，要看一个最缺乏资源的人走进法院时，能否得到认真回应；看一个被指控的人，能否充分为自己辩护；看一个没有背景的人与权势发生冲突时，法律能否仍然站稳。卡普里奥法官已经离去。但他带给我的那份温暖，仍然提醒我，人可以期待一种更有尊严的生活。我也愿那片曾经生活过的土地上，人们有一天不必先打听关系，不必把自由耗在无尽的等待里，不必把得到公正寄托于偶然遇见一位好人。他们能够坦然走进法院，相信自己的证据会被审视，自己的声音会被听见，自己的权利值得受到保护。

文中摘句

“他们能够坦然走进法院，相信自己的证据会被审视，自己的声音会被听见，自己的权利值得受到保护。



写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夜

作者：邓一鸣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张致君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在中共二十届五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我更关心的，不只是会议将作出哪些决定，而是中国未来究竟要走向哪里。

这些年来，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也积累了越来越多值得正视的问题。经济压力、就业困难、社会保障、权力监督、司法公正以及公民权利，都与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认为，一个国家真正长久的稳定，不应只依靠管理和控制，更应该建立在法治、公平、公开以及人民能够真实表达意见的基础之上。

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法治和监督并不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而是减少冲突、维护稳定的重要保障。改革开放以来，行政诉讼制度逐步建立，普通公民可以依法“民告官”；近年来，政府信息公开、听证制度和基层协商也在一些地方发挥作用。这些制度虽然仍需完善，却说明一个道理：当权力能够被规则约束，当公众能够通过合法渠道表达诉求，社会矛盾就更有可能在制度框架内得到解决。

公民参与同样能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无论是社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还是公众通过人大建议、政协提案、网络问政等方式反映问题，只有让真实意见能够被听见、被回应，公共政策才更容易获得理解和支持。相反，如果诉求长期缺乏公开、透明、有效的回应，误解和不信任就可能不断积累，最终影响社会稳定。

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追求民主、自由与法治从来不是一条平坦的道路。许多人曾经为此付出努力，也有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但正因为道路艰难，我们才更需要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思考今天的问题，并讨论未来可能的方向。

我期待未来的中国，是一个权力受到制度约束、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能够依法表达、政府接受社会监督的国家。不同意见不应被简单视为威胁，而应成为发现问题、改进政策、推动社会进步的一部分。人民能够通过公开、和平、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国家事务，也应该成为现代中国应有的方向。

五中全会前夜，我们讨论“中国民主之路”，不是为了停留在过去，而是希望从历史走向现实，再从现实思考未来。

如果要让我对未来的中国说一句话，我想说：愿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有机会通过合法、和平、制度化的方式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

文中摘句

> **愿有一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有权利表达自己的声音，也有机会通过合法、和平、制度化的方式共同决定国家的未来。**

王怡牧师是否真的颠覆国家政权

作者：XIAOCAI LIU | 翻译：戈冰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位于四川成都的秋雨圣约教会（前称秋雨之福教会）确由王怡牧师与其妻子蒋蓉等人共同创建。

该教会的发展与创立

2005年：王怡在2005年成为基督徒后，于当年正式在其成都的家中创办了“秋雨之福团契”。

正式成立（2008年）：随着聚会人数增加，该团契于2008年发展成为家庭教会，并正式命名为“秋雨之福教会”。

2018年1月，教会在发展中更名为“秋雨圣约教会”，当时已发展至拥有一个母堂和多个布道所、数个分立教会的大型独立家庭教会。

王怡牧师于2018年9月在讲道中公开表示“习近平若不悔改必要灭亡”以及人人（包括习近平在内）都是罪人。

王怡因为这句“习近平若不悔改必要灭亡”，在2018年12月9日，警方大规模搜捕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王怡及妻子蒋蓉等上百名信徒被带走，教会随后被官方取缔。

2019年12月，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非法经营罪”判处王怡牧师有期徒刑9年。

现在王怡牧师被关押在四川成都金堂监狱，并被爆出肝癌晚期。蒋蓉师母多次要求探监都被拒绝。

圣经中记载：【使徒行传 7:51-52】 —— 司提反在殉道前的讲道：“你们这硬着颈项、心与耳未受割礼的人，时常抗拒圣灵！你们的祖宗怎样，你们也怎样。哪一个先知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他们把预言义人要来的人杀了；如今你们又把那义人卖了，杀了。”

先知耶利米：因宣告审判与悔改被囚于淤泥牢狱

耶利米被称为“流泪的先知”，他一生劝勉犹大国悔改、离弃偶像，却被同胞视为叛徒。【耶利米书 38:6】：“他们就拿住耶利米，下在哈米勒的儿子玛基雅的牢房里……牢房里没有水，只有淤泥，耶利米就陷在淤泥中。”

圣经中记载：司提反和耶利米都因为对王和整个民族呐喊警示遭遇了迫害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今天王怡牧师同样遭遇了这样的患难。同样现在中国的王他也不能听这样的警示，并捉拿王怡牧师下监，一关就是九年。

人生能有几个九年？而且是在人生最宝贵的黄金时期被监禁失去自由，并且政府已经对外公布：王怡牧师已经肝癌晚期！就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曾经也是父母的骄傲，老师所喜悦的学生，父母花尽一生积蓄培养出来的人才，因为在中国这个信仰不自由、言论不自由的光景下被毁了。

中国有句古话：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么现在中国的王，你为什么害怕这样的警示呢?

文中摘句

> **中国有句古话：身正不怕影子斜。那么现在中国的王，你为什么害怕这样的警示呢？**

高楼之下：繁华与文明的距离

作者：蔡政 | 翻译：戈冰 | 编辑：李晶 | 校对：熊辩 | 美编：冯仍

改变一个时代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能是无数普通人，在漫长岁月里不肯放弃的微小坚持。

当你走在今天中国许多城市的街头，高楼大厦林立，宽阔的道路四通八达，繁华的商业中心灯火通明。对于初次来到中国的外国游客而言，这样的景象或许足以令人惊叹。

我来到美国以后，曾与一些美国人谈起中国。当我向他们讲述中国的政治制度，以及普通人在现实生活中可能面对的问题时，他们往往感到惊讶。

因为他们看到的中国，更多是高铁、摩天大楼、庞大的制造业和繁华的现代都市。

但我想告诉他们，这并不是中国的全部。

一个国家的高楼越来越高，是否就意味着社会越来越文明？经济越来越发达，是否就意味着人民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与尊严？

在我看来，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件事。

一、中国不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是中国，中国人民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政治组织。

这三者绝不能混为一谈。

中国有数千年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土地和人民。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一个政党的历史，不能等同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

中国人民创造的财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私人财产。中国劳动者付出的汗水，也不能被一个执政党全部据为自己的政治功劳。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将党的领导与国家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官方政治话语中，党的利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往往被描述为高度一致。

我希望更多人能够看清这种叙事背后的逻辑，并学会区分政党、国家与人民。

一个政党可以声称自己代表人民，却不能因此剥夺人民批评它的权利。

一个政党可以宣称自己取得了执政成就，却不能因此免于为历史错误和现实中的权力滥用承担责任。

从“反右”运动、“大跃进”时期的严重饥荒、“文化大革命”，到1989年“六·四”事件中的武力镇压，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发生过一系列造成重大人权伤害和社会灾难的事件。这些历史不能因为今天的高楼大厦而被抹去。

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严厉批评，针对的是它的政治制度、历史责任以及权力运作方式，而不是中国人民。

中国人民中有无数勤劳、善良、诚实的人。他们同样可能是权力滥用和不公平制度的承受者。

批评中国共产党，不是反对中国；追究执政党的责任，也不是否定中国人民。

恰恰相反，正因为尊重中国人民，才更应该认真对待他们的权利、尊严和生活处境。

中国的未来不应该由任何一个政党独占定义权。无论一个政党执政多久，它都不应该凌驾于人民之上。

中国属于中国人民，而不属于中国共产党。

二、中国的经济奇迹，究竟是谁创造的？

今天中国的高楼大厦、庞大的制造业体系和繁华的商业中心，常常被当作中国共产党执政成就的证明。

但我们不能忘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恰恰发生在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之后。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受到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引入外国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让中国进一步进入全球贸易体系，获得了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外国企业带来了投资与订单，国际市场提供了发展机会，而数以亿计的中国劳动者，则以自己的青春、汗水和相对低廉的劳动成本，支撑起中国制造业的迅速扩张。

因此，中国经济的发展，绝不是某个执政党关起门来创造的奇迹。

它离不开国际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更离不开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

然而，当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大国，当一座座现代化城市拔地而起，我们更应该追问：创造这些财富的普通劳动者，是否真正公平地分享了发展的成果？

一个长期掌握政治权力的执政党，不能把人民劳动和国际合作带来的经济成果全部归功于自己，却在面对腐败、社会不公和利益分配问题时，回避自身应当承担的责任。

经济建设的成果，不能成为拒绝政治监督的理由。

更不能因为修建了高铁、建设了城市，就认为人民应该放弃对自由、法治和公平的追求。

三、经济增长的数字，能否代表普通人的生活？

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人们常常习惯于关注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出口规模以及城市建设。

这些数字固然重要，却无法完整反映普通人的生活。

一个国家可以拥有庞大的制造业产能，可以生产大量商品，也可以建设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但如果普通家庭对收入、就业和未来缺乏信心，那么经济增长带来的成果，就未必能够充分转化为生活中的安全感。

经济发展的意义，不应该仅仅是让国家拥有更大的经济规模，也应该让劳动者获得合理的收入，让普通家庭拥有稳定的生活预期，让社会成员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的机会。

我曾在中国经营公司，从事影院行业。后来来到美国，又开始从事建筑装修工作。

不同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关注普通劳动者和经营者的实际处境。

一个人努力工作，究竟能否依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合理的回报？一家企业认真经营，是否能够在公平的环境中参与竞争？

如果经济发展不能让更多普通人拥有安全感，那么再漂亮的经济数字，也不足以说明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进步。

四、当潜规则成为生存规则

正常的商业竞争，应该依靠产品、服务、信誉和经营能力。

然而，当行政权力过多地影响市场机会，而相关决定又缺乏透明度时，经营者就可能被迫把大量精力花在处理关系上，而不是改善产品和服务。

我认为，这种现象对社会的伤害，远不止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

当一个人发现，认真遵守规则未必能够得到公平待遇，而拥有关系和背景的人却可能获得便利，他对规则的信任便会逐渐动摇。

起初，他可能感到愤怒，也可能试图坚持原则。但如果一次次坚持换来的都是损失，有些人最终便会选择妥协。

最令人担忧的，不是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错，而是明明知道，却逐渐觉得自己没有其他选择。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劣币驱逐良币”。

一个原本诚实的人，可能先因为坚持原则而吃了苦头，随后对公平失去信心，最后开始模仿那些曾经伤害过自己的行为。

明明自己也是受害者，最终却成为了这条利益链中的一环。

明明自己不愿意这样做，却又觉得不这样做就无法生存。

当这种现象不断重复，不公平便不再只是个别人的行为，而可能成为一种不断自我延续的社会机制。

我并不认为所有普通人都失去了良知。恰恰相反，正因为仍然有人坚持诚信与原则，公平的制度才显得格外重要。

一个社会最深的危机，或许不是坏人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多原本相信公平的人，开始不再相信公平。

五、权力不能只享受发展的成果，却不承担发展的责任

在我看来，要理解这些问题，就不能回避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政治体制。

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中国共产党居于国家政治生活的领导地位。普通民众无法通过全国性的竞争性选举更换执政党，新闻媒体和公共表达也受到政治限制。

当公共权力缺乏充分有效的外部监督，普通人面对不合理的行政决定时，便可能缺少足够有力的制衡渠道。

权力如果能够影响资源分配、经营机会和个人前途，而相关决定又不够透明，就容易产生寻租和利益输送的空间。

这种风险不仅存在于经济领域，也可能影响社会对公平的整体认识。

如果一个人是否获得机会，不仅取决于能力和表现，还受到政治背景、人际关系等因素影响，那么规则的公正性就值得追问。

有些人习惯于用经济增长回应政治批评。

谈到权力监督，就展示高铁；谈到表达自由，就展示城市建设；谈到社会公平，就列举经济总量。

但这些问题根本不能相互替代。

修建一条高速铁路，不能证明一个公民拥有充分的表达自由。

建设一座现代化城市，不能证明公共权力受到独立监督。

提高国家的经济总量，也不能自动证明财富分配公平。

中国共产党长期掌握国家政治权力，也应当对权力运行中的制度性问题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

一个国家真正需要的，不只是能够推动经济增长的行政能力，也包括能够限制权力、保护权利、纠正错误的制度。

六、教育不只是学校里的课本

我认为，要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教育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但教育不只是学校里的课程和考试。

有时候，一位身在海外的普通人，向国内一位年轻人分享一段真实的历史、一份可靠的资料，或者一种不同的思考方式，也可能成为教育的一部分。

一个孩子在课堂上学习诚实守信，走进社会却发现关系有时比能力更重要，投机取巧有时比遵守规则更容易获得利益，他究竟应该相信哪一套道理?

父母告诉孩子要善良，要诚实，可当孩子看到现实中的不公平时，父母又该如何解释?

社会本身也是一所学校。

一个人的价值观，不仅受到家庭和学校影响，也受到社会环境、历史知识、公共信息和日常经历的影响。

真正有价值的教育，不应该只是要求人们接受某种标准答案，更应该培养独立思考的能力，让人们学会寻找证据、比较不同观点，并且有勇气提出疑问。

学校不是教育的唯一来源。

书籍、互联网、海外研究、历史资料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可能帮助人们拓宽视野。

而这些看似微小的事情，恰恰是身在海外的普通人也能够参与的。

一个人分享一点可靠的信息，一个人帮助别人了解一段被忽略的历史，一个人愿意耐心解释事实。这些努力也许微不足道，但如果能够长期坚持，便可能逐渐汇聚成更大的力量。

与其只是在远方不断喊口号，不如认真想一想：自己今天究竟能够做些什么?

当然，来自外界的信息也不一定全部正确。真正的独立思考，不是从盲目相信一种说法变成盲目相信另一种说法，而是能够核对事实，形成自己的判断。

现实中，有些海外人士可能因为个人利益、过去受到的伤害，或者长期看不到改变的希望，而逐渐忘记了最初的理想。

但我们真的非要等待某位“伟大领袖”出现，才能开始做一些事情吗?

如果每个人都在等待别人站出来，那么改变又从何开始?

七、海外的舒适生活，不应成为脱离现实的理由

1989年“六 · 四”事件之后，美国通过包括1992年《中国学生保护法》在内的措施，为当时符合条件的中国公民提供了移民身份方面的保护。

几十年过去，当年的许多留学生和海外中国人，已经在美国有了稳定的生活。

获得安全和稳定的生活，本身没有任何值得指责的地方。



概念插画｜城市繁华与社会生活主题

文中摘句

改变一个时代的，未必是惊天动地的壮举，也可能是无数普通人，在漫长岁月里不肯放弃的微小坚持。

渡江 ——献给阿亮以及所有点燃生命的人！

作者：徐光 | 翻译：吕峰 | 编辑：李晶 | 校对：周敏 | 美编：冯仍

雾锁的江是我梦中的大海
海浪在胸中澎湃
渡船就是远航的舟
彼岸通向那遥远的天河

起锚吧
把所有的激情
抛向浓雾的天空
用双手紧紧拥抱桅杆
让湿润的感觉
洗净一身的风尘

鱼儿在水中畅游
那是一个多彩的世界
荡漾起心头的浪漫
用一份孩子般的纯真
编织起美丽的童话
送走那世俗的烦恼
把欢笑写在脸上

如果是枯萎的树枝
别让它无声地腐烂
点燃它
光明是永恒的追求

--------徐光 10/07/1995

注释：

阿亮，中国民主党人陈子亮。1967年生人，2022年7月6日，杭州国保为收集徐光罪状嗾使缙云国保将陈子亮抓捕至缙云看守所拷问，同年12月24日陈子亮被折磨致死。

《渡江》原诗选句

> **如果是枯萎的树枝**
> **别让它无声地腐烂**
> **点燃它**
> **光明是永恒的追求**

下沉时代，我们没有资格苛责沉默者

作者：张磊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Gloria | 校对：熊辩 | 美编：冯仍

在我的评论区，常有人指责国内的沉默者，甚至冷嘲热讽说“受苦是活该”。

这五个字，让我难过。

跨越山海、身处自由彼岸的我们，很容易在安全感中产生一种错觉——以为“发声”只是动动嘴唇，却忘了高墙之内，那可能意味着失去工作、被约谈，甚至连累家人的未来。

我们没有资格苛责沉默者，因为我们早已不在场，无法替他们承担开口后的代价。

一、站在安全区的指责，是一种制度与地理的特权

在海外，公开发声面对的是观点交锋；而在强维稳与高管控的语境下，面对的却是生存底线的崩塌。

当下的现实是：普通人的生存容错率已被压缩到了极点。

经济放缓、就业内卷、债务悬顶，加上社会兜底机制的缺失，让抗风险能力变成奢望。断供的房贷、父母的医药费、孩子的奶粉钱……有些人的工资还没到账，就已经被生活预支殆尽。

坐在异国的咖啡馆劝人“勇敢一点”很容易；但身处漩涡中心的人，想的却是：“要是我出了事，谁来养活一家老小？”

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我选择站出来，是因为我来到了自由之国，有能力应对代价；但我绝不能因此要求身处风险之中的人，去承担他们根本无法承受的后果。

站在岸边的人，不该轻易指责急流中的人为什么不肯松开手里的木头。

二、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体制高压下的理性自保

在维权成本无限大，正义概率极其微弱的现实面前，许多人的沉默并非麻木，而是一种被逼出来的自保。

他们看见不公也会愤怒，但删删改改的文字背后，是敏感词与封号的隐形威慑；是深夜停好车后独自咽下的委屈；是为了不让背上的一家老小跌落，而不得不弯下的腰。

在如今的经济下行期，光是“让一个家庭不坠落”，就已经耗尽了一个普通人所有的勇气与能量。这份平凡的责任，同样沉重且值得尊重。

三、真正的觉醒：身在海外，更不要失去共情与判断

体谅国内亲友的沉默，并不意味着随波逐流。正因为我们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才更应保持清醒：

看清宏大叙事的代价：当某种声音要求普通人“共克时艰”却避谈具体保障时，我们要清楚——宏大叙事的阵痛，凭什么总由最脆弱的个体承担？

拒绝高高在上的审判：打破信息茧房，听见真实的疾苦。不网暴、不嘲讽，不对国内无法发声的人进行道德绑架。

保持认知上的清醒：行为上可以谨慎自保，但心中仍要分清是非。不去相信谎言，不把体制性的不公视为理所当然。

四、允许有人举火，也允许有人护住微光

英雄之所以值得敬重，是因为他们自愿承担了超出常人的风险。但英雄主义是自愿的奉献，绝不能变成隔岸观火者的道德绑架。

我们可以鼓励勇气，但不能替风暴中心的人决定牺牲。

时代的一座山落下来，落到普通人身上，往往就是一句：“再撑一撑，先把今天过好。”

不苛责沉默者，是对远方亲友处境最深切的体恤；在沉默中保持清醒，是为自己与未来守住尊严与底线。

愿我们既敬重逆风举火的勇气，也理解风暴中护住微光的难处。

文中摘句

> 站在岸边的人，不该轻易指责急流中的人为什么不肯松开手里的木头。



AI概念插画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

作者：张兴贵 | 翻译：吕峰 | 编辑：钟然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

摘要：中央计划经济难以掌握分散且瞬息万变的社会信息，缺乏有效的价格信号与反馈机制，容易导致资源错配、决策失误与经济失衡，暴露出其在信息处理与资源配置上的结构性困境。

第一章 第二节 “全知规划者”的幻觉：中央计划经济的信息困境

在共产主义的经济图景中，私有制与市场竞争被视为混乱、无序与浪费的根源（即所谓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为了消除这种无序，共产主义主张建立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由国家统一收集全社会的资源、需求与生产能力信息，然后制定出一套涵盖所有经济活动的宏大计划。

然而，这套构想建立在一个隐性的、却极其脆弱的认识论假设之上：存在一个“全知”的中央规划者。

一、信息海啸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一个中等规模的现代国家每天产生的经济行为与交易信息是无与伦比的。从一粒纽扣的生产成本，到千家万户对某种食品的实时偏好；从某家工厂机器零部件的磨损程度，到下一个季节服装样式的流行趋势……这些信息的数量以海量计算。

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将这些庞杂的信息全部上传至一个顶层决策机构（如国家计划委员会），再由该机构计算出每种产品的生产数量、原材料分配额度以及出厂价格。在现实运行中，这种模式立刻遭遇了信息处理能力的物理极限：

信息的失真与延迟：信息在自下而上的层层上报过程中，必然遭遇极其严重的时效滞后与人为篡改。基层的生产单位为了争取更多的资源、降低自己的考核指标，有强烈的动机虚报需求、隐瞒产能。

计划的僵化与脱节：当中央计划委员会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制定出包含上百万种商品的“五年计划”时，市场实际的需求、技术条件与自然环境早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导致“计划赶不上变化”的讽刺现实。

二、假定“数据已知”的逻辑谬误

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建立数学模型时，往往会假定“已知供给函数与需求函数，求解均衡价格”。许多早期主张计划经济的学者（如奥斯卡·兰格）据此认为，只要拥有足够强大的算力（如现代计算机），中央计划部门就能联立解出成千上万个方程式，从而实现比市场更高效的资源配置。然而，这种观点的致命漏洞在于：它把经济学数学模型中的“假定已知”，错当成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已知”。

在现实的市场中，根本不存在任何现成的“供给函数”或“需求函数”等待计划部门去收集。消费者自己往往都不清楚自己在三个月后具体需要买什么、愿意为此支付多少价格，直到他站在商品面前做出选择的那一刻；生产者也不知道某种新产品能否成功，直到它投入市场接受检验。

这些数据只有在市场交易的动态过程中才会产生。中央计划经济试图在没有市场交易的前提下事先收集这些数据，无异于缘木求鱼。

三、结构性信息屏蔽与反馈机制缺失

在一个自由市场体系中，信息是通过价格波动和盈亏信号进行实时纠偏的。如果某种商品短缺，价格上涨，利润增加，就会立刻吸引资本和劳动力进入，短缺随之缓解；反之亦然。这是一种自下而上、高频、敏感的反馈回路。而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取消了自由价格与市场竞争：

纠偏机制完全依赖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计划部门无法获知某种商品究竟是真正过剩还是假性过剩，是需求不足还是分配不均。

错误无法被及时识别，甚至会被政治意志不断放大，直到演变成全社会范围内的商品大匮乏或严重的资源浪费（例如，一边是重工业钢材的极大过剩，一边是轻工业日用品的极度匮乏）。

第一章第三节 哈耶克知识问题：分散知识、隐性知识与价格机制

对共产主义认识论缺陷最致命的解构，来自于奥地利经济学派代表人物、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在1945年发表的划时代论文《社会中知识的利用》中，哈耶克彻底颠覆了人们对“知识”和“信息”的传统概念，给中央计划经济贴上了认识论上的死亡标签。

一、知识的两种形态：科学知识与“特定时空知识”

传统观念（特别是共产主义的理性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知识”就是指那些可以被公式化、文字化、统计化的科学定律、技术数据和生产指标。如果知识仅仅是这些，那么理论上将它们集中到一个中央数据库中确实是可行的。

但哈耶克指出，对社会经济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往往是另一种形态的知识——“特定时间和地点之具体情况的知识”，亦可称为分散知识或隐性知识。

这类知识包括：一个机器操作工对某台旧机器特定脾气和磨损状况的直觉掌控；一个季节性商人对当地突发天气变化引发的特定商品需求的敏锐察觉；一个物流调度员对某条道路临时拥堵所掌握的避让路线；每一个普通消费者在特定时刻对某种商品的边际偏好。

这类知识具有极其鲜明的特征：

高度分散性：它零散地分布在数以亿计的社会个体头脑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其全貌。

不可文字化与不可统计性：许多隐性知识甚至连拥有者自己都无法用语言精准表达（如“我知道怎么骑自行车，但我无法用物理公式向你解释我如何保持平衡”），因而根本无法填入行政统计表格中上报给计划部门。

瞬息万变性：这类知识随着时空条件的变化而随时生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

二、价格机制的本质：一种分散信息的通信系统

如果社会所需要的知识是高度分散、不可集中且随时变化的，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究竟是如何实现协调运转的?

哈耶克的答案是：自由市场中的价格机制。

价格绝不仅仅是买卖商品时付出的货币数量，在本质上，价格是一个极其巧妙的信息压缩与传播系统。例如，假定世界上某个地方突然发现了一种新的锡矿开采技术，或者某个主要锡矿发生了塌方导致产量剧减。对于一个远在万里之外的罐头制造商来说，他完全不需要知道锡的产地究竟发生了什么政治、自然或技术变动，他也不需要去读计划部门下发的文件。他只需要看到一件事：市场上锡的价格上涨了。

这个上涨的价格信号，立刻将庞大复杂的全球供求变化信息，浓缩为一个简单的数字变动，并向全球所有的相关经营者传递了一个指令：节约用锡，或者寻找替代品。

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哪个人在扮演“指挥官”，也没有任何中央计划机构在下达命令。价格机制通过自发形成的信号网络，协调了全球数以亿计互相不认识的个体的行动，使得全社会的资源得到了高度精准且迅速的重新配置。

三、共产主义对价格机制的摧毁

共产主义体制强行废除了私有产权与自由交易，取消了真正的市场价格，转而由国家计划部门统一进行行政定价。

这一举动在认识论层面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它直接切断了社会上唯一能够高效传递分散知识的信息网络。

当价格不再由自由供求关系决定，而是由计划官员凭空制定时：

价格就彻底失去了表达稀缺程度与个人偏好的功能。

价格变成了一串毫无意味的行政数字，无法指示资源的真实价值。

整个社会陷入了“信息的黑暗时代”。

计划部门官员面对的是一个失去了价格参照系的经济黑洞。他们不知道应该生产100万双鞋子还是1000万双鞋子，不知道应该把钢材分配给农机厂还是汽车厂。因为缺乏价格信号，任何资源分配的决策都变成了盲目的拍脑袋和政治博弈。

《政治民主》第六章2-3节

作者：祝正明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黄吉洲 | 校对：程筱筱 | 美编：冯仍

编者按：

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早期组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亲历者。1990年代，他潜心研究民主政治，写成《政治民主》一书，并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筹建过程中积极贡献自己的思想与力量。

在中国民主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的年代，祝正明坚持思考国家的未来，探索民主政治的原则与制度。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一位民主党人对自由、法治和人民权利的追求，也为我们了解中国民主党早期的思想探索留下了珍贵资料。

《在野党》连载《政治民主》，是为了铭记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向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心血与牺牲的前辈致敬，也希望鼓励更多读者接续思考：如何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尊严的中国。

思想的探索始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期待读者结合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和今天的社会实践，继续阅读、讨论，让前辈的思考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与发展。

(二)民主政治的任务

任何社会,要使社会生活有序化,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实行法制。但是,法制社会并不等于就是民主社会,一个治理得很好的、有条不紊的社会有可能是一个完全没有人权的专制社会,其法律被作为统治者手中的一个工具,仅用于约束百姓的行为。政府官员自己制定法律,可以将政府官僚自己所有行为合法化,当统治者侵犯百姓的利益时,百姓将无处告诉,无处伸冤。因此，只有使法律凌驾于政府之上,对政府也有约束力,才能真正有效保障百姓的利益。民主政治的任务就是建立起对政府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当政府行为与民间利益发生冲突时,由完全独立的、 有民意代表性的第三方担任裁判者,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政府官员滥用职权,保证审判的公正性,公平合理地解决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冲突。这一法律体系能否建立,取决于全体公民是否有充分的主权在民意识,是否有充分的政治参与热情和社会正义感,公民自身的这三项素质是这一法律体系存在的支柱。

民主法制的原则就是政府各部门的行为必须有法律依据。 在一个健全的民主国家,如果警察要逮捕公民或进行征税,他必须能证明其行为有法律依据,而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意志,并能经得起独立法庭的验证。如果政府官员要扩充自己的权力,必须有立法机关的授权。 依法治理的原理在于如果一个公民受到政府的不良影响, 他应该有能力直接就行政部门行为的合法性向法院提出质疑,而不是仅限于向该部门提出抱怨。法庭必须能独立于被控告的行政机关而存在,人员、经费不受行政机关的控制,能自主决定司法行动,能够裁决,宣布行政机关的行为不公正、无效并要求其赔偿损失。任何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如果超越职权行事,国家首脑与普通警察一样,都要在法庭面前接受审判。

(三)民主政体的优点

进入本世纪以来,民主政治在全世界各国迅速普及,并以空前的速度带动了经济、文化、科技的发展,给全人类带来了幸福繁荣。概括起来,民主政体有以下几项优越性:

一、使国家的政治权力返回到广大民众手中,消除了国家重大政治、经济问题由个别人决策所产生的任意性,确保了国家政策能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全社会的总体利益,避免了个别人的决策失误给全社会造成的危害。政府的职责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志为社会提供大多数人所共同需要的公共服务,而不是由政府官员去指挥命令公众按他们的意志办事。

法律是大多数人意志的结晶,公正的立法程序能够确保法律在民众心目中的威严和地位,约束了政府官员的行为,使政府官员丧失了特权,保证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得到贯彻执行。

1984年,美国政坛上一件不为人注意的小细节很能说明民主政治的实质问题。当时,美国总统里根担任总统已四年,是下一个四年任期连任的候选人,在里根总统和他的对手蒙代尔之间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电视辩论。辩论的规则要求,每个候选人只能在限定的时间内发言。当里根在未意识到他的时间已经用完的情况下继续发言时,讲话被一位负责协调的女士打断,她告诉他， 他已用完了所分配给他的时间.于是.里根总统只得中断了自己的发言。在专制国家.这

种现象,即国家元首在对全国范围的电视观众讲话时可以被打断,并被告知不能把他的话讲完,而必须终止,几乎绝对不可能发生。然而,在民主化社会,这被认为是一件正常而合理的事被人们所接受,甚至不会引起更多的议论。 每个人都假定并期望总统能象他的对手那样遵守同样的规则,与其他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如果总统在民众面前违犯了人们的这种期望,他会发现他在政治上将遇到麻烦。

二、社会的法治化和公正性,增加了公民的社会责任感, 由于建立了常备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减少了政府官员中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现象,排除了不称职的领导人出现的可能,促进了社会公德的良性发展。

公民的选票不会把一些既无才又无德的人抬上领导岗位。 人们靠运气指望能有包公为自己作主的现象成为过去,社会时刻都能有自己信得过的人在为自己服务,消除了少数人的社会寄生现象,使政府官员必须勤奋努力地为大众工作才能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政治民主化社会,人们意识到政治问题与自己的利益密切相关,意识到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影响法律政策,人们对政治的关心与参与就会有很高的热情。国家在民众心目中占据着显耀的位置,从乡村到城市,居民关心社会的每一项事物就象关心自己的利益一样,人们以国家的光荣为荣,相信自己对国家的成就会有所贡献,感到自己随国家的兴旺而富裕,并为从全国性的繁荣中获得好处而自慰。他们对国家的感情与对自己家庭的感情类似,有一种自私的心理促使他们去关心国家。

三、政府只是一个全社会性的服务机构,拥有权力的人并不能将权力换变成自己的财富,而且使用这种权力受到种种限制,任何人都不能再企求在政府中任职可以获得除薪水以外的收入,官场将不再是人们竭尽全力去奋斗的人生唯一目标。

社会的自由与平等使人的个性与创造性在工商业与科技领域得到充分施展,使每个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都能过上富裕的日子。繁荣了社会的经济建设,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当政治运作法制化,权力的使用规范化以后,政府官员为争权夺利而消耗国力, 严重影响民众生活的现象将会消失,政府处理的大部分事务将都是与经济有关的问题。民主政体是大多数人决策的政体,任何一个社会,最富裕与最贫困的人都是社会的少数,绝大多数人是能过得上体面生活的中等收入者,因此,民主政体可以认为是一个由中等收入者控制的政体。由社会的富裕者控制的政体往往安于现状,而由社会的贫困者控制的政体则可能会作出不近乎人情的决策。中等收入者中的一部分人.可能成为富裕阶级.也可能成为贫困者,他们能更好地使法律政策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当然, 民主政体也会颁布许多更有利于中等收入者的法律,对此,富裕阶级尽管认为不平等,也无能为力。因此,在私有经济社会,许多富有者并不欣赏民主,他们认为民主决策效率低,易产生混乱, 时常会制定不近乎人情的法律,如向他们者征收高额税款等,如果由他们这样的少数精英分子来管理社会,他们卓越的才干可以把社会管理得更好,其中部分人甚至倾向于专制统治,具有拥护专制统治的潜意识。

民主社会的一种倾向是,当人们在工商业界有了充分施展才能的机会后,人们就不再将官位看得非常重要。在今天的民主国家,富有阶级很少参加政治活动,他们无法在公共生活中占有他们在私人生活中占有的那种地位,所以便离开官场,埋头从事工商经营。因此,民主政体应注意的是,不应使重要政府官员的薪水过低,以免吸引不到优秀的人才。

在一个国家的民主政体建立初期,各种思想理论和思维方式将层出不穷,国家的权力将经常易手,人事、法律和政治架构将处于飘忽不定状态,而且未必为时甚短。自由与专制不同,它通常诞生于暴风骤雨之中,甚至在内乱的痛苦中长大,只有在它已经长大成熟的时候,人们才能认识到它的好处。爱动和喜变是民主制度的本性,正如停滞和昏睡是专制君主制度的特征一样。

在民主体制下,社会政治权力的渊源在社会的最基层,即权力来自于广大的民众,民众是权力的主人,政治决策是以民为主,政府只是民意的代理执行者。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政治权力的渊源在社会的最上层,君主是所有权力的主人,政治决策以君为主,政府是君主意志的执行者。这是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两种制度政治权力的本质区别, 如图6.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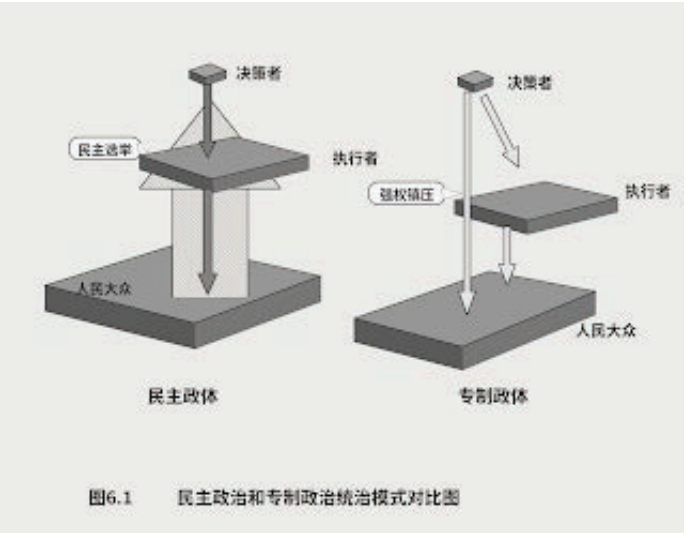


图6.1 民主政治和专制政治统治模式对比图

第七章 民主政治的运作

作者：祝正明 | 翻译：戈冰 | 编辑：赵杰 | 校对：孔祥庆 | 美编：冯仍

编者按：

祝正明是中国民主党早期组党的重要参与者，也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亲历者。1990年代，他潜心研究民主政治，写成《政治民主》一书，并在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的筹建过程中积极贡献自己的思想与力量。

在中国民主事业面临重重困难的年代，祝正明坚持思考国家的未来，探索民主政治的原则与制度。他的著作，既记录了一位民主党人对自由、法治和人民权利的追求，也为我们了解中国民主党早期的思想探索留下了珍贵资料。

《在野党》连载《政治民主》，是为了铭记和传承这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向为中国民主事业付出心血与牺牲的前辈致敬，也希望鼓励更多读者接续思考：如何建设一个自由、民主、公正、尊重人的尊严的中国。

思想的探索始终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期待读者结合这部著作的历史背景和今天的社会实践，继续阅读、讨论，让前辈的思考在新的时代得到传承与发展。

实现政治民主，有三个重要问题需要解决：（一）、如何产生民意？（二）、如何制约权力？（三）、如何形成决议？民主政治经过两百年的摸索和发展，到今天，对上述问题已经有了一整套完善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民主政体的四项组织原则：分权原则、代议原则、多数原则、任期原则。

（一）分权原则

民主政治思想认为，不能过于相信人的忠诚。人的私欲是没有止境的，如果不加以限制，势必使人类社会陷于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没有制约，政府并不会比普通人更少犯错误。

有权力就会有腐败，拥有绝对的权力，就会有绝对的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制止腐败。

如何制约权力，是民主政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个国家的政府，不论在权力上、在组织效率上、在经济实力上、在人员数量上，与任何形式的民间组织相比，都要强大得多。它掌管着与国家国民经济有关的各部门，其下属的众多的机构管理着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方方面面。中央政府或其下属部门的任何一项行政指令或条例，都将影响成千上万人的切身利益。如果这些官员都能时时处处为平民的利益着想，那无疑是广大百姓的幸运。

政府的概念：一般来讲，政府是指统治国家的政治权力机构的总称，但在分权制的民主政治模式中，国家政治权力分别由三个机构掌握：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通常也被单独称为政府。

但是，假如他们漠视百姓的利益，恣意妄为、刚愎自用，百姓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即便只是他们中间的一部分人或者是个别人的不负责任，也足以使众多百姓的利益生灵涂炭。就算他是经人民选举产生的官员，曾经取得过人民的信任，但当他手中掌有大权，具有与其原先完全不同的地位，身处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以后，他是否还会保持其在做平民百姓时所持有的思想观点和激情呢？对此，谁也不敢作出保证。人本身就是多变的动物，当他发现自己有众多机会而又无任何风险就能为自己或亲属捞取好处时，他未必能保持廉洁自律。他很可能成为因为握有权力而自持高人一等、粗暴蛮横、盛气凌人的新贵族。就算公民是具有强烈主权意识的公民，对自己权益遭到侵犯具有极高的敏感性，并能做出迅速反应，但是，普通百姓要想直接抑制身居高位的人的行为，绝非易事。即便他们有良好的组织性，组成各种维护自身利益的团体，随时可以游行抗议，但是这种民间团体的分散力量仍然无法有效地同政府庞大的专业力量相抗衡。

任何人都希望自己能为所欲为，握有权力的人总是有滥用权力的趋势，那些经过选举产生的人也不例外。那么，进行选举是否还有意义呢？民主政治思想认为：防止滥用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分权制，以权力约束权

力，非得把制定法律的权力交给代表人民的集合体——议会，人民才能感到安全和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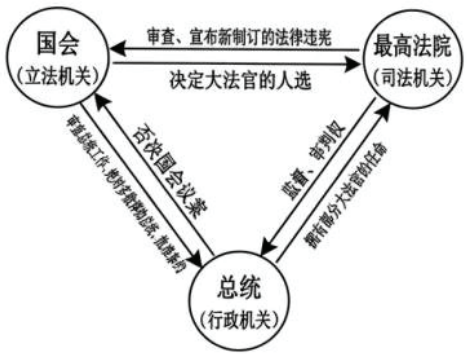
减少当局权威有两种方法，一是剥夺当局在某些情况下的自卫能力，二是将权力分散，分别交给许多人掌握，分散权威之后，权威的不可抗拒性和危险性就被减弱，但权威本身并没有被破坏，既削弱了官僚的权力又加强了政府的权威。

分权制的中心思想就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按照法制社会权力性质的不同，分为三种不同的性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分别交由不同的机构和人员来掌管，使其相互制约，相互监督，防止掌权者权力过大。将滥用权力的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人都有一种名誉感，当人知道有人在监督自己时，往往会自觉把事情做好；当人知道无人监督时，则往往会放任自己。

分权制减弱了个人或少数几个人在国家政治决策中的作用，使任何人要想操纵整个国家机器都不再可能。假如某个大权在握的人一意孤行，徇私舞弊，即便其任期未满，也能按既定的法律程序将其革职或弹劾，而不会引起任何政治动荡。这就是三权分立，或三权鼎立，如下图所示。

对总统的制约：总统缔结条约，任命官员，设立部、局机关必须由国会同意；



政府财政预算，财政拨款必须由国会批准；国会可以对总统的欺诈、受贿等渎职犯罪行为提出弹劾，由最高法院进行审判。

对国会的制约：总统可以否决法律和财政议案；最高法院可以宣布国会通过的法律不符合宪法而无效。最高法院和总统对国会制约的目的在于防止国会在少数人的操纵下匆忙通过不成熟的法律。

对最高法院制约：总统对最高法院法官有提名权，国会批准任命，并有免职权，国会决定最高法院的管辖权，最高法院判决的执行，大部分情况下要依赖于政府官员的协助。

任何社会，如果三种权力合为一体，由当权者独揽一切，就无人能动摇当权者的地位。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由同样的人行使，就会给人性的弱点以极大的诱惑，由于他们有特殊的地位和巨大的权力，与广大民众有不同的利益，他们就会使法律适合他们自己的利益需要。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合二为一，那就不存在裁判者，由行政管理者或其下属给百姓造成的损失或不幸就无法向公正无私的，有权裁判的人或机构提出申诉，以期得到补偿和解决。如果谁敢与执政者相对抗，他们总是能让法官找出罪名给你定罪。如果立法权与司法权合二为一，则可以完全控制总统，使总统成为议会的傀儡。

法律由执政者来制定，法律就会成为为政府服务，约束百姓的工具。只有使国家的立法权与行政权相互分离，才能保障法律能服务于百姓的利益、约束政府的组织过程和运作方式，使它不会偏离民众的需要，因此，立法权必须高于行政权。同样，执政者都有滥用权力的倾向，必须要有一个独立的、具有民意代表性的司法机构来监督行政权的行使，制裁行政权的滥用行为，才能保证行政权被正确而慎重地使用。因此，可以认为，一个国家，要想保障公民的权利不受政府侵犯，就必须确保两点：第一，必须将政府的权力进行分立；第二，必须按照公开的明文规定组织政府，依法治国。

制订法律必须能代表民意，立法机关必须是民意的代理议事机关，由一批地位平等、来自全国各地的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民选代表组成，由他们对各种社会问题及法律草案进行仔细、充分、全面的分析讨论，制订、通过和修改法律。立法机关被称为国会或议会，民选代表即国会议员，由全国各地民众按事先分配的名额直接选举产生，定期改选。

国家的公共事业、日常事务由政府、即行政机关来管理，行政机关的任务就是依照立法机关所制订的法律，解决社会各类问题，应付临时性事件，就一些简明问题，颁布政策性文件，管理社会各项公共事务，为人民大众及经济发展提供服务，保障社会的安定有序发展。政府的下属机构众多，其设立、撤销和预算经费必须有代议机关批准。民主政治的实践表明，行政权由一人掌握比由数人掌

握效率要高得多，对社会更有益，因此，该项权力保留由行政机关首脑个人掌管，实行个人负责制。政府首脑必须由国民选举产生，定期改选，候选人由各党派推荐，经初选、预选后进入最终决选。

解释法律、监督法律的执行，裁决各种争端，对违法事件进行审判的权力，则交由独立的、不受行政机构控制的司法机关来行使。其最高机关为宪法法院或最高法院，主要负责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执行、审判违宪行为、裁决涉宪纠纷。它有权判决任何人、包括总统在内。成员由数名地位相等的大法官组成，按多数制原则通过决议。人选通常以间接民意选举产生，实行任期制。

三权分立是人们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而总结出的一种有效、合理而简捷的民主政治结构模式，它使掌权各方即拥有明确的权力，又不能滥用这种权力。这种模式已经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得到应用，被证明有效可靠，保证了民主制度能够长期、稳定地运行下去。它的另一个优点是，行政上重大疑难问题的决策交由国会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能增加决策本身的可靠性，减轻执政者个人对重大决策所承当的过重的责任，节省其精力用于事务性管理。

分权制的特点：

（1）它不是积极地增进效率的制度，而是积极地防止滥用职权的制度；不是为了避免权力之间的摩擦，而是直接通过不可避免的摩擦，使民众从专制统治下解脱出来。

（2）它是对掌握、行使国家权力的个人，持以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为出发点而建立起来的。

（3）它具有自我协调解决内部争端的机制，是注重民众权利的政治组织原则，目的完全在于维护公民的自由与人权。

一个国家有无独立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它是否由民主选举产生，是否能充分代表民意，在换届时是否能平稳过渡，是否能进行长期稳定的运作，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可以称为是真正民主、文明、法制社会的根本标志。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除了将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还将庞大的行政权进一步分离出半独立性质的人事权和财政审计权，隶属于立法机构，目的亦在于进一步有效地防止执法者可能出现的腐败行为。

（二）代议原则

民主政治的中心思想就是国家根据民众的意志来治理。但是，民众的意志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意志可能就是民众的意志，也可能根本不是民众的意志。因此，如何产生民意，如何将民意这一概念具体化，是实现民主政治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实现政治民主的原始方法，就是以全体公众集会的方式，讨论国家的政策、法律，行政管理等社会公共行为，以多数制形成决议，委派专人去执行，这是直接民主制，即由公民直接参与政治权力的行使。它的优点是：每个人都亲自参与决策，关心社会问题，讨论社会问题，最终形成妥协达成一致，使得每个成员都能感觉到自己作为集体的一员，实实在在地参与了决策过程。

一个国家，从经济立法到处罚刑事犯罪，从建设电站道路到筹集警察经费，从监督食品卫生到进行环境保护等等，社会事务极其繁多，是否都能让全体公民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聚集在一起讨论决定呢？显然，直接民主制在小国或小的行政区可以实现，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幅员广阔，地区习惯和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的大国实际上无法操作。另一方面，处理各种事务必须要有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在当今社会的各种新知识新技术新问题层出不穷，复杂多样的情况下，人们通常只能了解某一方面的知识，而且也未必都很精通。其次，公众也不可能都有充分的空余时间来考虑与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他们还要忙于处理自己工作中的各种事务，为应付日常生活而忙碌，人们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感兴趣。因此，除非个别关系到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重大问题有必要交由全民进行讨论公决外，社会的日常事务由全体公民共同直接管理是不现实的。民主政治的历史经验表明，全体公民聚集在一起并不适宜讨论问题，用这种方式管理国家效率非常低下，不具备可操作性。

但是，尽管民众不可能都有各种丰富的知识、足够的兴趣、充分的时间参与政治决策，他们却有充分的能力判断在他们中间谁最有能力和知识，代表他们的意志，维护他们的利益。在现代社会，民众可以选出自己的代表，授予他们决策的权力，让他们替自己制定政策。实践表明，民众对选派自己的代表代替他们去参与政治事务，既有能力又有兴趣。由此，让一批直接由公民选举出来的代表组成的议事机关来代替公众讨论制订国家的法律与政策，就是代议制，这是一种间接民主制。它能够满足民主政治所要求的三点：

（1）代表公民的意志；

（2）保证议事者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充分的议政能力，使社会的精英分子不受任何出身的限制就能脱颖而出，为大众提供最好的服务；

（3）充分的议事效率。

代议机关的代表数量应能对全国民众的民意有充分的代表性，同时应避免人数过多，造成代表机构过分庞大，降低议事效率，增加国民负担。

如果议事者并非由人们直接选举产生，而由已经掌握行政大权的人指定，则这种“代表”只会代表统治者的个人意志，不能保证他们是公众利益的代言人。确定人选时的任人唯亲，无法保证这些人有良好的个人素质和充分的议事能力。代表人数庞大，不仅使议事效率低下，还会成为国家的一大财政负担，使立法机关变成一个老态龙钟的养老院，政府政策的举手机器，当政者手中的橡皮图章。这是专制统治下立法机关的实质。

代议制是简化由民众直接参与讨论与处理国家公共事务所可能引起的混乱、纷争，提高议事效率的一种方法。是国家最高权利属于全体人民的一种政治形式。代议机关的工作是商议各种影响到民众利益的重大问题，制订法律，并监督其执行情况。各国的实践表明，代议机关能很好地胜任这项工作。实际上，也只有它才有权力从事这项工作。

在代议制政体下，每个公民都是国家的主权人，能够通过投票或参与竞选影响国家的政治进程，他们自然会更关心国家的公共事务，如有兴趣和能力，还会有担任公共职务的机会。这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根本区别。一个社会的统治管理者是否经过具有竞争性的、由全体公民自由地、公开地、不记名地选举而产生，是一个社会是否已摆脱专制统治的具体表现。

文中摘句

> **有权力就会有腐败，拥有绝对的权力，就会有绝对的腐败，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制止腐败。**

民主政治四项组织原则

分权	代议	多数	任期

为什么共产主义在结构上无法实现（连载）

作者：张兴贵 | 翻译：吕峰 | 编辑：李晶 | 校对：周敏 | 美编：冯仍

第一章 认识论陷阱：全知理性与信息不可知性（第四节）

第二章 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产权、价格与激励机制（第一节）

第四节 确定性谬误：复杂演化系统与线性机械论的冲突

共产主义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认识论缺陷，在于其采用了过时的线性机械论世界观，来理解本质上属于复杂非线性演化系统的人类社会。

一、还原论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局限

19世纪的物理学盛行“还原论”与“拉普拉斯决定论”。拉普拉斯曾断言：如果有一个智者（即所谓的“拉普拉斯妖”）知道某一时刻宇宙中所有粒子的位置和动量，他就能够利用牛顿力学公式计算出宇宙过去和未来任意时刻的状态。

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深受这种机械决定论的影响。它试图将复杂的社会变迁，简化为“生产力发展-生产关系变革”的单向线性因果链条。它相信只要控制了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个“总开关”，就能按预期产出完美无瑕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现代科学（尤其是系统论、混沌理论与复杂性科学）已经深刻揭示：由海量相互作用的自主个体构成的社会系统，是一个典型的“非线性复杂适应系统”。

二、涌现性与不可预测性

在复杂系统中，整体的属性并非各部分属性的简单线性叠加，而是通过个体之间纷繁复杂的局部相互作用“涌现出来的。例如，语言不是由某个古代语言学家坐在书房里一次性设计出来的，而是无数人在几千年交流中自发演化出来的；货币不是由某个国王发明的，而是交易双方为了降低交易成本在长期实践中自发挑选出来的市场媒介。

复杂系统具有以下几个根本特征，直接宣告了共产主义宏大规划的破产：

涌现性不可预先计算：你无法通过研究单个分子的属性来预判龙卷风的轨迹；同理，中央计划部门也绝不可能通过分析单个工人的生产率，来预判整个社会市场需求的动态演化。

蝴蝶效应与敏感的初始条件：社会系统中存在大量的正负反馈回路，微小的扰动可能引发巨大的连锁反应。行政部门下达的一个微小指令（例如调整某种农产品的收购价），可能会在几年后引发全局性的农业崩溃与饥荒。

个体的适应性行为：人不是棋盘上任由摆布的棋子（正如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批判的“棋盘棋子谬误”）。当国家出台一项计划政策时，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都会根据这项政策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如搞地下黑市、消极怠工、偷工减料）。这种自下而上的“反向适应”，会迅速冲垮自上而下的政策初衷。

三、试错机制的阻断与试错成本的无限放大

人类文明的进步，本质上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试错与演化”过程。在自由社会与市场经济中：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在尝试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组织形态。

绝大多数尝试都会失败（企业倒闭），但这种失败的成本被限制在局部（由投资人与企业承担）。

极少数成功的尝试会被市场筛选出来，被全社会模仿和推广，从而推动整个文明向前演进。

这是一个极其高效的“演化算法”。

然而，共产主义的中央计划体制阻断了这种自下而上的试错机制。由于公有制消灭了私人资本与独立创业的可能，所有的创新和决策都必须经过中央计划部门的审批。这导致了两个致命的认识论困境：

创新的窒息：任何突破传统框架的创新想法，在面对官僚体制的层层审批时，都会因为不符合既有的“五年计划”而被扼杀在摇篮里。官僚体制天生偏好守成与标准化，排斥不确定性。

错误的全局化与灾难化：在市场中，一个企业老板决策失误，顶多导致一家公司破产；但在中央计划体制下，由于决策权高度集中于顶层，一旦中央规划者犯错，这个错误就会被行政机器无限放大到整个国家。例如，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密植与深翻农业政策，或者苏联对李森科“伪遗传学”的行政强制推广，都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本章小结：认识论破产的必然逻辑

综上所述，共产主义之所以终究无法实现，其根本原因不在于道德建设不够完善，也不在于具体执行者的能力高低，而在于其核心理论框架建立在一座认识论的沙丘之上。

共产主义假设：

人类能够彻底掌握历史演进的客观规律（历史决定论谬误）；中央机构能够收集并处理全社会所有的经济与社会信息（全知规划者幻觉）；复杂的社会知识可以被完全统计化和集中化，而忽略了决定社会运转的分散知识与隐性知识（哈耶克知识问题）；人类社会可以像一部机械一样被自上而下精密设计，而否定了社会作为复杂系统的自发演化属性（机械论谬误）。

当一种政治与经济理论在认识论层面违背了信息传播的物理规律、人类理性的边界以及复杂系统的演化逻辑时，它在现实中的崩溃就不是一个“是否”的问题，而仅仅是一个“何时”的问题。

放弃“全知理性”的狂妄，承认人类知识的局限性与社会的不可彻底设计性，是人类走向理性与成熟的必经之路。也唯有在此认识论基础之上，倡导分权、保护私有产权、尊重自发秩序与自由选择的社会制度，才能真正为人类的繁荣与尊严提供永续的保障。

第二章 经济学的不可能三角：产权、价格与激励机制

在第一章中，我们从认识论的视角剖析了共产主义如何陷入“全知理性”的狂妄，并阐明了中央计划体制在信息收集与处理上的根本局限。然而，共产主义的认识论困境并非仅仅停留在“缺乏信息”的层面，它在经济学的底层逻辑上同样面临着一个不可逾越的结构性屏障——“产权—价格—激励”不可能三角。

任何一个社会要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转、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及技术的不断创新，必须同时满足三个基本条件：清晰的私有产权划分：作为市场交易与风险承担的法律前提；

自由形成的价格信号：作为衡量资源稀缺程度与引导经济计算的唯一尺度；

内生的有效激励机制：作为驱动个体付出劳动、承担风险与进行创新的动力源泉。

共产主义理论的核心诉求，正是试图通过全面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来同时消灭价格机制与市场竞争，进而构建一个由全社会统一计划、按需分配的乌托邦。然而，经济学基本规律表明，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互相锁定、缺一不可的有机整体。一旦消灭了私有产权，自由价格信号便失去了存在的根基，经济计算随之陷入瘫痪；而失去了价格信号与私有产权，基于个人利益与风险责任的有效激励机制便会瞬间瓦解，最终必然沦为普遍的惰性、严重的资源错配以及全社会性的物质匮乏。

本章将系统梳理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的理论成果，深入剖析公有制下价格机制瘫痪的内在逻辑，并揭示公有产权如何不可避免地引发“公地悲剧”、代理人危机以及经济活力的全面衰竭。

第一节 算力无法替代市场：米塞斯“经济计算问题”的理论奠基

1920年，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发表了一篇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计算》的划时代论文。这篇论文犹如一颗炸弹，彻底击碎了共产主义关于“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更高效”的理论神话，由此引发了二十世纪经济学界最著名的“社会主义经济计算大论战”。

一、什么是“经济计算”？

在讨论米塞斯的论断之前，必须首先厘清经济学中“技术计算”与“经济计算”的本质区别。

技术计算：关注的是“如何利用既定的物理手段达成某个具体的工程目标”。例如，建筑工程师可以利用物理学和力学原理计算出：建造一座跨海大桥需要多少吨钢材、多少立方米水泥、多少工时。这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问题。

经济计算：关注的是“在成千上万种可选的技术方案与资源组合中，哪一种方案在经济上是最划算的，最能够节约稀缺资源以满足全社会最紧迫的需求”。例如，建造这座大桥究竟应该用钢材、预应力混凝土，还是用木材？如果用钢材，这些钢材如果省下来去制造农用机械或者建造医院，是否会产生更大的社会价值？

在现实世界中，几乎任何一个生产目标都有多种技术路线可以实现。一个社会面临的根本问题并非“技术上能不能做”，而是“经济上值不值得做”。没有经济计算，人类就无法在无限的生产可能性中做出合理的选择，整个社会生产就会陷入无休止的资源浪费与盲目试错之中。

二、逻辑推导：没有私有产权，就没有真正的价格

米塞斯指出，合理的经济计算必须依赖一套统一的、能够动态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估值尺度。在现代复杂社会中，这套尺度只能是货币价格。米塞斯递进式地给出了社会主义无法进行经济计算的逻辑链条：

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彻底废除了生产资料（工厂、土地、矿山、机器）的私有制，将其全部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交易行为的消失：由于所有的生产资料都属于同一个所有者（国家），生产资料在不同工厂和部门之间的流动，不再是买卖行为，而变成了同一个实体内部的行政调拨。

价格机制的瘫痪：没有买卖，就没有市场交易；没有市场交易，就无法形成真正的生产资料市场价格。

经济计算的破产：没有生产资料的价格，中央计划部门就无法计算任何工业品或工程项目的生产成本，也就无法比较不同生产方案的投入产出比。

在市场经济中，一个资本家在决定是否开采某座矿山时，他会计算矿石的预计售价与开采所需的设备、人工、运输成本。如果预计收益高于成本，说明该开采行为创造了价值；反之则说明是在毁灭价值。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下，由于生产资料没有市场价格，中央计划官员面对庞大的原材料和设备库存时，完全不知道它们的真实价值是多少。计划部门只能用物理单位（如几吨钢材、几千千瓦时电、几百个工时）来记录投入，但这完全是“将苹果与牛肉相加”。你无法用“3吨钢材 + 500度电”与“2吨木材 + 100个工时”去直接比较谁更节约，除非它们都能被折算为统一的货币成本。

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将导致经济生活的完全盲目。中央计划当局可以在黑暗中摸索，但它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经济原则。

三、兰格模式的破产与现代“数字计划经济”谬误

针对米塞斯的批判，波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等提出了所谓的“竞争性社会主义”或“试错定价模型”。兰格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保留消费品市场，但在生产资料领域，中央计划部门可以扮演“市场”的角色（扮演的哪有真的好呢，说明还是需要价格系统）。计划部门先凭空设定一个初始价格，然后观察市场上该商品的供求状况：如果出现短缺就抬高价格，出现过剩就降低价格，通过不断试错来逼近“均衡价格”。米塞斯与哈耶克迅速对“兰格模式”进行了致命的反驳：

官僚缺乏承担风险的机制：自由市场中的价格试错是由无数自负盈亏的企业家用自己的真金白银进行的；而计划官员用国家的资产进行试错，既不承担失败的财务后果，也没有动力捕捉瞬息万变的市场契机。

静态拟合无法应对动态演化：兰格模型假设经济体系是静态的，计划部门只需计算出一组固定的均衡解。但现实经济是高度动态的，每分每秒都有新的技术、新的偏好、新的资源被发现。行政试错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市场演化的速度。

现代变体：“算法与大数据能复活计划经济吗？”

随着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现代某些“科技乌托邦主义者”重新拾起兰格的旧论，声称：“米塞斯时代的计划经济失败是因为当时缺乏算力。如今有了超级计算机与实时监控网络，中央系统可以实时获取每个人的消费数据，直接联立求解数千亿个联立方程式，从而实现‘数字计划经济’。”

这种观点完全误读了米塞斯与哈耶克的理论核心：

算力再强大，也只能处理已经发生的历史数据（如你昨天买了什么），而无法预测和计算在未来特定边际条件变化下人类的心理选择与主观估值。

更重要的是，没有自由价格，数据本身就是失真的。如果电商平台上的价格是行政管制的，那么抓取到的“消费数据”只反映了强制配给下的被动选择，绝不代表消费者真实的边际偏好。用超级计算机处理失真的数据，只会以更快的速度输出更加荒谬的计划指令，而不可能复活计划经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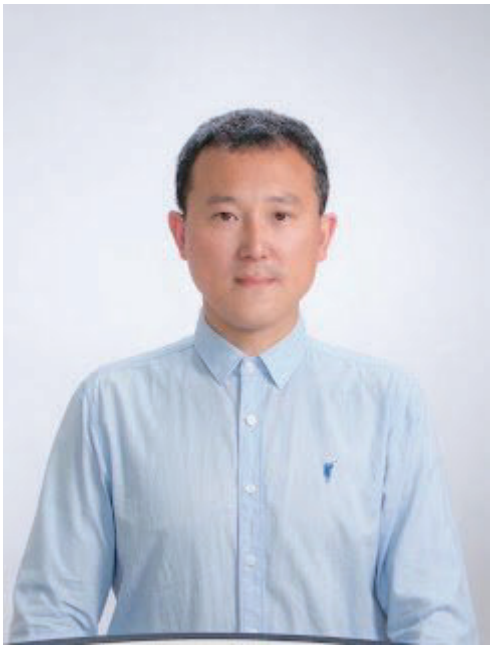
《在野党》中国人权观察简报第43期

作者：张维清 | 翻译：沈美花 | 编辑：冯仍 | 校对：冯仍 | 美编：冯仍

（2026年11月11日）

王君剑，1986年1月出生，籍贯吉林，前旅日异议人士，中国民主党党员。

最新近况：2026年10月30日，王君剑在中越边境送家人回国时，在越南芒街（对应广西东兴口岸）一侧被越南警方控制。同日下午，湖南省长沙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对其签发《刑事拘留通知书》。目前他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一、个人简历

1.、1986年1月12日出生，籍贯为吉林省，出国前曾长期在重庆生活。

2、重庆劳教：2011年10月，因在网络上发表政治观点，被重庆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由处以劳动教养一年。

3、公开街头演讲：刑满释放后，他曾参与线下纪念与公共表达活动。例如，2013年他曾在重庆杨家坪广场发表纪念林昭的街头演讲。

4、旅居日本期间。 在结束国内拘押后，王君剑前往日本定居生活。

5、加入民运组织：2025年2月，经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朱虞夫介绍，王君剑正式加入中国民主党，并在组织内负责宣传及招募发展新党员等事务。

6、越南被捕回国：2026年10月30日，他在中越边境的越南芒街（东兴口岸对面）送家人回中国时被抓捕。

二、政治立场

1. 反对一党专政，主张政治民主化：王君剑加入中国民主党，其政治路线是“坚持以和平、理性、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王君剑早年也曾因在网络发表反对中共现行体制的言论，被重庆警方处以劳动教养。

2. 推崇言论自由与思想解放：2013年4月，他曾在重庆杨家坪广场发表纪念林昭被枪决45周年的街头演讲。林昭是反右运动及文革时期的著名异议人士，公开纪念林昭象征着其对言论自由、独立思考以及反抗政治迫害的认同。

3.支持异议人士与反抗政治打压：旅居日本期间，他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声援国内异议群体，并公开表示在东京、千叶以及中越边境的广西东兴市设有免费落脚点（被称为“安全屋”），为出境逃避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实际的食宿与中转帮助。

三、被捕与判刑经历

1. 2011年10月：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之际，王君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政治言论，并在重庆南坪宏声广场背负青天白日旗进行纪念活动。随后，重庆警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为由将其抓捕。警方最终对他作出了劳动教养一年的决定，而非通过法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他被关押在重庆西山坪劳动教养管理所二大队，直至期满释放。

4.2026年10月30日：据其母亲李秀英向外界披露的信息，当天早上7时30分左右，王君剑在越南一侧被越南警方以“涉嫌吸毒”为名抓捕，并于当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到达中国境内。 回国后，中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式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根据家属收到的长沙市国家安全局出具的拘留通知书，他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湖南省国家安全厅看守所。

四、《在野党》人权观察部呼吁

1、严正抗议中共涉嫌实施的跨国政治迫害。我们要求当局相关部门立即公开说明王君剑是否被拘押、目前身在何处、由哪个机关控制，以及是否存在从越南被强制转移至中国的情况。如确已拘押，必须立即保障其人身安全、律师会见、家属联系及其它基本法律权利；如其仅因和平政治表达与民主活动遭到拘押，应当立即无条件释放。

2、要求越南政府立即调查并公开说明事件真相。我们呼吁越南政府调查王君剑于10月30日失去自由的具体经过，以核实是否存在未经正当法律程序的秘密移交、强制遣返或跨境绑架行为。任何国家都不应允许外国安全机构在其领土上非法逮捕、秘密转移政治异议人士。

3、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并采取保护行动。我们呼吁联合国有关人权特别程序、国际人权组织、美国及其它民主国家政府关注王君剑的处境，敦促有关国家公开事实、保障其安全，并依法追究任何非法跨境拘押行为的责任。

4、呼吁海外民主组织、人权律师及媒体在保护家属隐私及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协助查证事实，并推动依法救援。

文中摘句

> **呼吁海外民主组织、人权律师及媒体在保护家属隐私及人身安全的前提下，协助查证事实，并推动依法救援。**

中国民主党主办
《在野党》杂志社

总编辑： 朱虞夫　　**社长：** 郑存柱　　**出品人：** 景辉辰

荣誉主编： 毛庆祥（发起人）、谢长发（倡导人）、胡石跟、陈西、吕耿松、查建国、陈树庆、许万平、刘贤斌、胡明君、黄燕明

副总编辑暨副社长： 鲁慧文　　**常务副总编辑暨副社长：** 冯仍
秘书长兼轮值总编辑： 吕峰
日本分社社长： 漠北独侠 / 漠北孤侠

各部门人员名单

编辑部
部长：李晶
副部长：钟然
成员：默尔索、胡丽莉、周志刚、赵杰、韩立华、黄吉洲、Gloria Wang、Geoffrey Jin

收稿部
部长：马群
副部长：戈冰、田家元
成员：刘乐园、彭小亮

校对部
部长：程筱筱
副部长：熊洋
成员：王滨、毛一炜、孔祥庆、周敏、易勇

翻译部
部长：吕峰
副部长：周敏
成员：戈冰、沈美花

美编部
部长：张婷
副部长：闫梦菁
成员：傅鲍红

采访部
部长：贾嘉
副部长：沈美花
旧金山记者站长：缪青
成员：陀先闻、侯冰封、郝剑平、庄帆、韩震、唐鑫

宣发部
部长：Gloria Wang
副部长：彭硕、曾群兰、夏体姗
成员：何愚、黄吉州、李延龙、程筱筱、张晓丽、Rong、汪洋、易勇

信息技术部
部长：卢新虎
副部长：卢超
成员：李建伟、张湘满、程筱筱、张荣鑫、姜俊良、吕峰、胡丽莉

人权观察部
部长：黄吉州
副部长：张维清、陈娟
成员：何愚、老默、王晓华、周敏

公关事务部
部长：李享
副部长：王连江、黄国安、宋娟华
成员：翼超、张帅、刘乐园、蔡政、黄剑强。

外联部
部长：史庆梅
副部长：赵杰、王海霞
成员：常坤、张俊杰、汪洋、Rong

党史部
部长：何愚
副部长：周兰英
成员：孟清

新媒体部
部长：小舞
副部长：王晓华
成员：周兰英

财务部
部长：徐纪新
副部长：高哈
出纳：朱小观

行政部
部长：吕聪
副部长：张宇
成员：陈婷

投稿与联络： www.ZYD1998.com | zaiyedang1998@gmail.com
X： @zaiyedang1998 | **地址：** 228 N Garfield Ave #202,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SA
电话： +1-971-289-5163（吕峰）

亲爱的读者与战友们：

《在野党》是我们共同的火种，承载着无数中国民主志士二十七年来前仆后继的牺牲与期盼。这份刊物从1998年的坎坷中诞生，在铁腕与暴力下中断，却从未泯灭我们追求自由与正义志愿念。今天，我们《在野党》重新出发，这不仅是一次杂志的复刊，更是为中国民主、人权与法治而战斗的庄严誓言！

一路走来，我们深知前方依然布满荆棘。但我们也更加明白，只要有您的支持，这盏希望之灯就能持续燃烧。您的每一份捐款，都将帮助我们支付杂志制作、印刷与发行费用，帮助我们搭建更加广阔的传播平台，也为我们调查追害案例、组织采访交流提供有力保障，让《在野党》成为海内外民主力量集结的号角，让真相与呐喊直达世界各个角落。

历史的洪流正在前行，我们呼吁您与我们一起，不再沉默，不再退让！请扫描本页二维码，以 Zelle 捐款支持我们，让我们手牵手、心连心，共同守望一份对自由的承诺、一份对正义的坚持、一份对美好未来的追求！

您的善意将铭刻在《在野党》的史册中，您的力量也将成为中国民主进步最真实、最可靠的见证！

如有国际合作与联系意向，也欢迎通过 zaiyedang1998@gmail.com 与我们取得联系！请关注我们的官方推特：@zaiyedang1998，与我们保持密切互动，共同见证并参与这场改变中国未来的努力！

抗共救国，我们是认真的！为了中国民主自由，我们更加坚定！

《在野党》杂志社 敬上

Send Money with Zelle®
OPPOSITION PARTY INC

通过 Zelle 支持杂志
可直接转账至：
zaiyedang20250625@gmail.com
收款名称：Opposition Party INC
二维码沿用所提供图片，印刷前须测试扫码。

《在野党》2026年9—10月接收的捐款信息

日期(2026)	捐赠者	金额	用途
09/16	Jianqiang Huang	$200	捐助杂志社
09/16	Yunhui Ge	$150	捐助杂志社
09/17	Jiawei Wang	$150	定向：参赞曾爱京
09/17	Jisen Zhao	$180	定向：参赞曾爱京
09/28	Chao Ji	$200	捐助杂志社
09/28	Shuai Zhang	$100	捐助杂志社
10/05	Xiang Li	$1,000	定向：陈晔夫
10/05	Chao Ji	$100	捐助杂志社
10/05	Lequan Liu	$100	捐助杂志社
10/05	Zheng Cai	$100	捐助杂志社
10/05	Xiang Li	$100	定向：陈晔夫

幕后团队 | *The Editorial and Production Team*

《在野党》并非在真空中完成。从选题策划、内容编辑、事实核实与语言转换、到版式设计、校对、发布与长期维护，每一期的完成都依赖一支长期协作、分工明确的幕后团队。

团队成员分别承担文字编辑、资料核验、翻译协调以及版式与技术支持等工作。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出现在显眼位置，但正是这些持续、稳定的专业劳动，构成了杂志得以按期完成并保持质量的基础。

编辑与出版岗位分工说明 *Division of Responsibilities*

一 内容策划与选题统筹

由编辑团队共同完成选题方向的确立与内容结构规划，确保刊物在价值立场、主题连续性与公共讨论深度上的一致性，构成每一期内容生产的起点。

二 记者与写作

由前线记者、特约作者及撰稿人员组成，负责采访、资料整理、事实核实与写作，为刊物提供第一手文本内容与信息来源。

三 编辑与校对

由编辑团队对稿件进行结构性编辑与语言修订，并由校对人员对定稿内容进行文字、标点、事实与格式层面的复核，确保文本准确性、严谨性与出版一致性。

四 翻译与语言支持

由翻译与语言支持人员负责中英文内容的互译与语言协调，确保各语言版本在语义、语气与信息完整性上的一致，为刊物的跨语言传播提供保障。

五 版式设计与出版制作

由幕后制作团队完成刊物整体版式设计与出版制作工作，包括版式系统设定、页面结构规划、文字与图像编排、双语内容技术适配，以及印刷与数字版本的最终文件输出与校验。该环节承担将内容转化为可持续出版成品的关键制作流程，是刊物按期完成与质量稳定的重要保障。

六 发行与传播支持

由相关支持人员协助完成刊物发布、传播渠道协调与读者反馈整理，使出版成果进入公共视野并形成持续影响。

荣誉墙



戈冰

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收稿部副部长，兼任翻译部成员，主要负责稿件的接收、整理、分类及流转，同时参与杂志稿件的翻译与校对工作。

在具体工作中，始终保持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积极协助收稿部部长开展部门日常工作，注重与投稿人员及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为稿件的及时处理和编辑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持；同时，积极参与翻译部的各项工作，注重翻译内容的准确性与文字表达质量。

在承担多个岗位职责的过程中，展现出良好的责任意识、团队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以积极务实的工作态度履行各项职责，为提高杂志社的工作效率、保障杂志内容质量以及推动《在野党》杂志的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李晶

中国民主党党员，《在野党》杂志社编辑部部长，主要负责杂志稿件的编辑、审核、校对以及编辑部的日常管理与协调工作。

在工作中，他始终秉持认真负责、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注重文章的内容质量、文字表达与编辑规范，积极推动编辑部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他注重团队协作与沟通，协调稿件的编辑与审核工作，为保障杂志内容质量和出版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积极作用。

作为编辑部部长，他具有良好的责任意识、团队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以认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履行岗位职责，为提升《在野党》杂志的专业水平、传播质量及社会影响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海外民主实践与观察

Ideas and Practice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ISSUE 29 / NOVEMBER 2026

www.ZYD1998.com

中国民主党主办

An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China
© 2026 All rights reserved.

在野堂™
Opposition Party
Freedom. Truth. Resistance
www.ZYD1998.com

9 773069 451168

《在野党》ISSN 3069-4515 本刊为非营利政治刊物，所有销售收入将公开用于：资助受政治迫害者及家属；支持中国民主党行动；支持《在野党》杂志运营与国际传播。建议售价：$25.00